

## 江浙地區佛教的延續和轉變 ——以經懺佛事為中心(1949-1957)\*

劉瓊\*\*

1949年10月中國大陸政權鼎革，共產黨建立起新政府。為了維護穩定，政府發展多項政治、經濟、文化等運動，這些運動直接改變了佛教的生存環境。土地產權變革使寺院再不能依靠田租收入為生，「五反」運動以及隨後而來的所有制改造讓剛起步的僧尼生產事業陷入困頓，江浙僧團經濟條件發生較大變革。田租、布施、香火和生產所得受到衝擊，經懺佛事於僧團的經濟意義更為顯著。中共政權建立後七八年間，雖然佛教團體因種種社會運動受到改造，經懺佛事一直存而不絕。佛事成為僧團賴以為生的經濟助援，也是他們宗教實踐的重要形式。近現代歷史上，經懺佛事對僧尼和寺院的經濟意義以及對僧人修行的意義不容小覷。

關鍵詞：江浙地區、經懺佛事、儀式經濟、佛教生存

---

\* 本文寫作和修改過程中多次得到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韓鋼教授的悉心指導，又蒙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惠賜寶貴的修改建議。特致謝忱。

\*\* 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後。  
通訊地址：中國上海市楊浦區邯鄲路 220 號。  
通訊郵箱：liu\_q@fudan.edu.cn.

## 一、引言

1949 年 4 月 21 日，解放軍南渡長江。23 日，以南京為起點，江南各地陸續為中國共產黨勢力掌握。中共取代國民黨，正式成為這裡的新主人。釋樂觀、釋聖嚴、釋倓虛等一批僧人跨海南渡，到香港、臺灣開闢新的佛教事業。<sup>1</sup>更多的僧尼則留在中國大陸，經歷他們的因果命運。

儘管 1949 年後中國大陸佛教史的研究數量遠不及民國佛教史，幾十年間也出現了许多經典作品。臺灣學者侯坤宏和香港學者學愚通過地方檔案、僧人口述回憶等資料，呈現了 1949 年後中國大陸佛教的多重面向。總體上，兩位學者多強調中共對佛教的改造。<sup>2</sup>美國佛學專家霍姆斯·維慈(Holmes Welch)的作品《毛時代的佛教》(*Buddhism under Mao*)呈現的史實更為多元。作者同樣關注到 1949 年後僧尼大量還俗勞動的事實，但也發現經懺佛事等「迷信活動」的收入，仍是不少僧人賴以為生的經濟來源。他還關注到佛教徒如何利用「名義上合法化」的政治節日、抗美援朝等遊行示威活動進行表裡不一的宗教實踐。<sup>3</sup>雖然維慈的作品為後世學者理解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佛教情況提供了很多線索和視角，受限於史料，他仍未能對 1949 年後經懺佛事和佛教儀式經濟的轉變展開進一步的討論。

經懺佛事是一種為生者祈福、為死者薦亡超度的佛教儀式。因從事經懺的宗教職業者魚龍混雜，部分經懺佛事內容不符佛教教理，經懺佛事為許多

---

<sup>1</sup> 釋樂觀，《六十年行腳記》(臺北：海潮音社，1977)，頁 75-81；郁麗天，〈和尚的蛻變〉，《大公報》(香港)，1948 年 8 月 30 日，8 版；釋聖嚴，《歸程》(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214-215。

<sup>2</sup> 侯坤宏，《浩劫與重生——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大陸佛教》(臺南：妙心出版社，2012)；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sup>3</sup> 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57-266; Holmes Welch, "Facades of Religion in China," *Asian Survey* 10, no.7 (1970): 614-626.

高僧和學者指責和批判，也常被一些人視為近代佛教衰落的淵藪。<sup>4</sup>從學術的角度看，上述對經懺佛事的批評有一定道理，但過於簡單，忽視了經懺佛事對近現代佛教重要的經濟意義。從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懺佛事始終延續。這一事實本身就值得追問和解釋。1949年後，寺院的田租、香火、布施等收入減少，佛事收入對僧團的經濟意義更為顯著。本文認為，這一基本事實表明，經懺佛事的長期延續有其自身的理由和邏輯，並非一句「衰落的淵藪」能做定評。近現代歷史上，經懺佛事對僧尼和寺院的經濟意義以及對僧人修行的意義不容小覷。

本文試圖以經懺佛事為切入點，利用江蘇、浙江兩省多個地方政府和寺院檔案、僧尼口述以及報刊雜誌等史料，按照佛事自身的歷史特點，分三個時段考察闡釋 1949 年到 1958 年前中國大陸佛教的延續和轉變。

## 二、中共建政初期江浙地區佛教的境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一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向國民廣泛宣傳無神論並以此重塑社會觀念；另一方面也承認和規定國民宗教信仰的自由權，給宗教信仰自由留下法律 and 政策的空間。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宗教信仰自由被寫入會議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sup>5</sup>對於宗教團體和宗教人士，新政權承認和允許其繼續存在，甚至賦予其上層人士一定政治地位。同時又通過巨大的行政力量對其實施改造，建立實際上由新政權掌控的新的宗教團體。向宗教界灌輸新政權的政治理念和宣傳政府的各項政策方針，動員宗教人士特別是底層人士參

<sup>4</sup> 釋聖嚴，〈論經懺佛事及其利弊得失〉，收入《法鼓全集》編輯小組編，《法鼓全集》（臺北：法鼓文化，2020）第 5 輯第 5 冊，頁 194-215；聖凱，《中國佛教懺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頁 365-386；邵佳德，〈近代的應赴僧及經懺佛事——以江浙地區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第 4 期（北京，2014.08），頁 45-56。

<sup>5</sup>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 年 9 月 29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國文獻出版社，1992）第 1 冊，頁 2-3。

加生產勞動甚至還鄉還俗。新政權有關宗教的理念和政策，蘊含著一種內在張力：既延續宗教，又抑制宗教及其影響。

1951年1月25日，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談到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幾個問題。他批評了部分統戰工作者「狹隘」的工作作風：「看不見全域，只看見幾個和尚尼姑，認為他們是少數，中上層人士，少數民族，落後民眾在全國加起來只有幾千萬人，因此瞧不起他們，對他們實行關門。」<sup>6</sup>同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漢民族中佛教問題的指示〉，對佛教的具體工作做出相應規定。第一，對於僧尼問題，「既不可放任自流，也不可簡單急躁，應採取積極慎重的態度，既照顧到信仰，又照顧到生活」；第二，對於寺院房產問題，要與住持和尚協商，訂立合同，不要隨意佔用；第三，佛教團體應按照社會團體的要求登記；第四，佛教改革的權力交給佛教界。<sup>7</sup>

政府固然在法律、政策層面給予宗教生存的空間，為了維護治安穩定，<sup>8</sup>清除對新政權有敵意的國內外勢力，發動各項政治運動，例如清除反動會道門、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這些運動雖未專門針對宗教界，但對佛教產生很大影響。1951年中共中央〈關於漢民族中佛教問題的指示〉在具體問題上給了佛教界相對自由，但也將佛教政策與當時流行的主要政治運動掛鉤，強調1951年佛教工作最重要的兩項內容是：鼓勵佛教徒參加愛國運動並訂立愛國公約；在僧尼居士間展開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sup>9</sup>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打擊嚴懲各地反政權勢力。在這個大背景下，1950年12月，北京開始取締一貫道及其餘反動會道門。此後兩年，各地陸續回應。打擊會道門運動在1953-1954年間達到高潮。佛教義理和會道門截然不同，但民間佛教部分儀式如飲

<sup>6</sup> 李維漢，〈關於目前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幾個問題〉（1951年1月25日），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劍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2014）。

<sup>7</sup> 中共中央，〈關於漢民族中佛教問題的指示〉（1951年6月12日），收入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編，《統戰政策文件彙編》（內部發行，1958）第4冊，頁1941-1942。

<sup>8</sup> 學者楊奎松認為，靠武力奪取政權的中國共產黨，1949年前後一直不斷遭到各種反抗。1950年，西南川、康、雲、貴各省，匪亂不斷。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1冊，頁172-173。

<sup>9</sup> 中共中央，〈關於漢民族中佛教問題的指示〉（1951年6月12日），頁1941-1942。

食習慣等與一貫道等有相似之處。<sup>10</sup>一些基層幹部對宗教問題所知不多，常常將佛教和會道門混為一談，加之打擊反革命運動常有「大捕大殺」的失控情況，<sup>11</sup>佛教也受到牽連。<sup>12</sup>

如果說取締會道門只是間接牽扯到佛教，土地改革對寺院經營和僧團生活的影響更直接。1950年2月以來，江南各地陸續進入土改準備階段。<sup>13</sup>根據政策，江南寺廟的田地絕大多數屬於徵收之列。

考慮到僧尼的生存問題，政府也制定了相應政策，為僧尼留下自養的土地。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3條規定：農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阿訇，有勞動力，願意從事農業生產而無其他職業維持生活者，應分給與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sup>14</sup>但在實際執行中，卻出現許多問題。一些地方官員特別是鄉村幹部多憑「無神論」等觀念認知宗教問題，對宗教政策的理解既偏頗，又膚淺，加之作風簡單粗暴，土改過程中處理佛教事務發生不少過激行為。<sup>15</sup>

江浙地區絕大多數寺院的經濟因土地改革發生巨變，尤以叢林道場(僧尼數量眾多、財產公有的大型寺廟)所受打擊為大。1949年以前的民國時代，句容寶華山、常州天寧寺、南京棲霞寺等叢林道場，擁有數千畝的土地。承平之日，寺院可以依靠租穀收入自給自足。不足之處，佛事、齋主捐贈等收入亦能支持寺院的正常運營。土改之後，絕大部分叢林道場的田產被官方沒收，

<sup>10</sup> 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頁374-375。

<sup>11</sup>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1冊，頁171-217。

<sup>12</sup> 〈常州天寧寺歷史資料的編寫提綱(第三次稿)〉(1959年2月12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8-1959-2-2-50。(本文引用的資料多只開放到文件級，無法查閱全宗名。故錄件名、日期、典藏地及檔號，俾於查索。)

<sup>13</sup>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江蘇省志：農業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56-61。

<sup>14</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頁340。

<sup>15</sup> 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土地改革中若干問題的通報〉(1951年4月)、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佛教、回教工作的指示〉(1952年3月)，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劍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2014)。

僧人無法再依靠田租收入，安坐禪堂、念佛堂，從事各種信仰實踐活動。為了生存，他們只得轉業從事生產。

1950 年土改法規定給僧尼和農民同樣的土地和生產資料，但有一個前提：宗教職業者必須有「有勞動力」。叢林道場往往有許多五六十歲以上無法參加勞動生產的年老體弱的僧尼。政府按照勞動力標準分配的土地，寺裡要用它養育更多的僧尼。例如，1949 年後地方政府按照 50 位勞動力給鎮江金山寺分配土地，但寺中共有 100 多位僧人，餘下的一多半年老體弱無勞動力的僧人根本沒有分到土地。所有僧人只能依靠 50 人分到的土地生活，無法滿足基本溫飽。為了生存，金山僧眾只得通過織布、織毛巾、創設火葬場、打草席等謀生。<sup>16</sup>

金山的情況並非個例。土改對「有勞動力者」才能分到土地的規定，導致大部分叢林無法從土地中獲得足夠的產出養育全寺僧眾，有勞動力的僧人和年老體弱的僧人衝突和矛盾頻發。常州天寧寺、句容寶華山都出現了這些問題。

土改之前，天寧寺至少有 8000 畝田產。依靠田租和佛事收入，天寧寺有能力維持數百常住僧人、佛學院學僧及寺中俗家工人的開銷。土改時，寺內有 10 多位僧人，主動將天寧寺田戶名單和收租簿交給常州市政府，並協助工作隊下鄉進行土改，寺裡的 8000 畝田產被分割一空，<sup>17</sup>僅留存旱田 20 餘畝。<sup>18</sup>寺中僧人無法依賴田租為生，只得轉向生產。<sup>19</sup>田租無法獲得，餘糧又被借徵，天寧寺又收留了來自其他寺廟的二三十個老弱病殘的僧人，寺裡的經濟壓力日益加劇。<sup>20</sup>

<sup>16</sup> 一禪，〈鎮江金山江天寺略況〉，《弘化月刊》，第 1 期(上海，1952.01)，頁 14。

<sup>17</sup> 〈常州天寧寺歷史資料的編寫提綱(第三次稿)〉(1959 年 2 月 12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8-1959-2-2-50。

<sup>18</sup> 〈關於天寧寺情況的調查報告〉(1955 年 4 月 26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14-1955-1-5-219。

<sup>19</sup> 〈常州天寧寺歷史資料的編寫提綱(第三次稿)〉(1959 年 2 月 12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8-1959-2-2-50。

<sup>20</sup> 本安和尚，1942 年來天寧寺佛學院學習，1958 年前一直住在天寧寺。1952-1953 年，連續兩次被選為天寧寺委員，負責寺內外大事小情，相當於舊時的方丈、監院等職。金山寺本安法師口述，馮辰年、周文逸、楊樹慧採訪記錄，〈解放前後的天寧寺〉(1986 年 4 月 15 日)，天寧寺檔案館藏，無檔號。

句容縣寶華山與天寧寺所差無幾。1949 年後，寶華山數百僧人星散各地，山上只剩 120 多人。1951 年，寶華山所在的句容縣完成土改，寺裡原有的數千畝土地大多被政府徵收，重新分配後寺裡僧人僅分得 138 畝田地。<sup>21</sup>分得的土地秋收之後才能接手耕種。青黃不接之時，山上僧人的生活相當艱苦，每天啜粥二餐，還時常斷炊。<sup>22</sup>有的僧人嗷嗷待哺，以致食草充饑。<sup>23</sup>

1949 年以前的民國時代，除了抗日戰爭後期通貨膨脹極為嚴重的幾年，田租收入對靈岩山而言，不若寶華山和天寧寺那般占主要地位。但是土改對該寺的衝擊仍然不小。截止 1949 年，靈岩山共有稻田 1083 畝，蕩田 1688 畝，<sup>24</sup>連同山地、基地、荒田等，合計田地 3004 畝(山場、桑地除外)。1950 年蘇南土改後，這些土地很快被政府重新分割。雖然中央規定僧尼道士等職業專家可分得與農民同樣數量的土地，在實際分配過程中，蘇州市政府並沒有參照農民的標準(每人一畝七分到二畝五分左右)分配寺僧土地，寺僧每人只分得五六分地，僅為農民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方丈妙真此前兩年創設的靈岩山農場農作部變得重要起來。有數十位僧人主動加入到生產勞動的隊伍。但是，無論再怎麼精耕細作，仍遠遠無法滿足山上五六百僧眾的日常生活需求。「屋漏偏逢連夜雨」，這一年，蘇南發生了數十年不遇的特大水災。寺廟附近耕種的寺田淪陷，搶救不及，秋收無望，所剩餘糧難以維繫，寺裡鬧起了饑荒。<sup>25</sup>

揚州高旻寺的情況更為慘澹。1925 年，高旻寺在方丈來果的改革下徹底斷絕經懺佛事。此後寺中各項開銷靠田租、香火及齋主捐贈等收入，以田租為主。1949 年前，高旻寺有僧眾 220 人，土地 4000 多畝，分布在高郵、寶

<sup>21</sup> 花妹，〈隆昌寺廟產知多少〉，《句容文史資料》(句容：句容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第 9 輯，頁 106。

<sup>22</sup> 方子藩、陳三洲、倪正和等，〈為寶華山隆昌寺僧眾募化齋糧緣起〉，《覺有情》，第 3 期(上海，1950.03)，頁 24。

<sup>23</sup> 上海市佛教協會，〈上海市佛教協會教理研究室座談會：討論關於肅清上海佛青出版的《覺訊》及小冊子中反動言論影響的問題(摘錄)〉，《弘化月刊》，第 1 期(上海，1956.01)，頁 14。

<sup>24</sup> 蕩田：人們在江河湖海等水邊開墾的新地。一般賦稅較低。夏亨廉、肖克之主編，《中國農史辭典：中國農史普及讀本》(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4)，頁 258。

<sup>25</sup> 靈岩寺，〈蘇州靈岩山寺各部門福利事業概況表〉，《弘化月刊》，第 8 期(上海，1951.08)，頁 12-13。

應、儀征以及邗江縣的汊河公社一代。<sup>26</sup>1949年後，寺中至少還有190位以上的僧人。但寺裡大部分土地被政府徵收，只留給僧人40畝田。<sup>27</sup>全寺從方丈到沙彌僧全部吃著「墨黑的粥湯，還和著一半次米，一半秕糠和豆餅，個人面前除了一碟臭鹽菜之外，什麼都沒有。」為了生存，寺裡僧眾節衣縮食，省下錢來買了20台織布機和往返揚州和上海之間的兩艘木船，創辦三家小商鋪。<sup>28</sup>

除了田產大幅減少，1951年，據上海市佛教會反映，各地土改都出現一些焚毀佛像，強迫僧尼結婚、還俗，禁止和尚念佛，沒收寺廟財產的情況。<sup>29</sup>寺廟的房屋全部或部分被軍隊、政府機關、學校等團體徵用。<sup>30</sup>迫於生存問題，大量僧尼還俗轉業，僧團數量驟減。<sup>31</sup>留在寺院中的僧尼不得不為自養問題煩惱。

### 三、經懺佛事的延續和變化

土改對寺院的影響，不僅表現為對寺院廟產的直接徵收，還表現為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因土改發生變化後，寺方從外界獲得的捐贈大幅減少。<sup>32</sup>重新分得土地的農民負擔也不小。據統計，1951年，公糧、土地證、土地稅、朝

<sup>26</sup> 〈關於對高旻寺開展社教運動的請示報告〉(1966年5月6日)，揚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1-3-54-39。

<sup>27</sup> 〈關於禪慧和尚錯劃為右派分子的改正決定〉(1980年12月16日)，揚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1-203-33-189。

<sup>28</sup> 從善，〈我們應該向揚州高旻寺看齊〉，《覺訊》，第7期(上海，1951.07)，頁4-5。

<sup>29</sup> 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土地改革中若干問題的通報〉(1951年4月)、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佛教、回教工作的指示〉(1952年3月)，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

<sup>30</sup> 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頁191-211；蘇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蘇州市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第3冊第52卷，頁1128-1131。

<sup>31</sup> 蘇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蘇州市志》，第3冊第52卷，頁1134；〈上海寺院〉，《弘化月刊》，第9期(上海，1949.09)，頁8。

<sup>32</sup> 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 61-62.



鮮戰爭促生的飛機捐款等各項支出佔據農民收入的 27% 左右。<sup>33</sup>民眾經濟負擔加重，手中餘錢減少，齋主布施和香火相應減少。

土改後，田租幾不可得，有限的土地要供養超額的僧眾，齋主供養、香火減少，留給蘇南僧尼的選擇並不多。許多人轉業還俗，另尋出路。仍然留在寺院的人，除了參加各種生產之外，似乎只能繼續在佛事市場中尋覓。

土改時期，江浙各地廟產受到不小衝擊，但佛事活動沒有斷絕。中共似乎有意為僧尼依靠經懺佛事生活留下餘地。1951 年 9 月，陝西省榆林市僧人大昶致信《現代佛學》編輯部，<sup>34</sup>詢問靠經懺吃飯的僧人能否繼續趕經懺。該刊主編巨贊回復：

念經拜懺，超度亡人，這是我國習俗「祖宗崇拜」的需要，恐怕一時還不能熄滅。出家人為吃飯而趕經懺，根本違犯佛制，佛教被人家看不起，就是由此而來。但他們除此又別無生路，再加上文化水準低，過去生活又自由散漫慣的，所以要他們自覺自願的轉業或從事勞動生產是有困難的。不知道在榆林的佛教徒可以組織學習小組否？如能組成，先從學習政治開始、對於提高認識，一定會有說明的。(育之)<sup>35</sup>

1950 年 9 月，《現代佛學》第一期介紹雜誌緣起的文章裡提到《現代佛學》的六個任務，第一條是「傳達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處理佛教問題的方針。」<sup>36</sup>作為該刊的主編，巨贊的觀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央統戰部等宗教管理部門的觀點。從上述回復來看，即便是以積極「革新」獲得官方青睞的佛教代表巨贊，對「落後」的經懺佛事的態度也頗為實際。

部分地區允許僧尼繼續從事經懺佛事，也沒有放棄從中抽稅的打算。西方學者注意到共產黨的宗教政策與前政權(明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等)之

<sup>33</sup> 王海光，〈蘇南土改往事〉，《同舟共進》，第 11 期(廣州，2016.11)，頁 73-77。

<sup>34</sup> 育之是巨贊的筆名。巨贊，名僧，佛教代表。1949 年 10 月，他和趙朴初作為佛教代表出席第一屆中國政治協商會議，是半官方的佛教刊物《現代佛學》的負責人之一。1952 年中國佛教協會籌備會重要組織者，1953 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長期擔任副會長。巨贊與新政權高層交往並被委以重任的經歷史，參見 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 7-11; 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頁 108。

<sup>35</sup> 〈問題商討〉，《現代佛學》，第 9 期(北京，1951.09)，頁 20。

<sup>36</sup> 巨贊、喜饒嘉措等，〈緣起〉，《現代佛學》，第 9 期(北京，1950.09)，頁 32。

間的延續性，<sup>37</sup>卻忽略中共如何利用稅收管理佛教。這可能是他們過於關注共產黨和宗教團體在意識形態上對立的結果。事實上，中共在儀式經濟方面十分務實，早在華北革命老區，儀式用品的稅收已經是共產黨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sup>38</sup>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領導的根據地就已經徵收「迷信品稅」。1946年4月，中共建立的山東省政府頒布了若干稅率法規，有條文規定：「無論經營性質如何，消耗品、迷信品和特產品三類商品，均要向地方稅務部門納稅。」以山東省渤海區為例，該地的「迷信品」稅徵收項目包括燒紙、黃裱、神香、金銀箔、鞭炮、神蠟、神畫、冥鈔、紙紮等。鞭炮、神蠟按原價30%納稅，其余則按60%納稅。1946年中共北滿前沿根據地設立吉北稅務局。在該局工作兩年(吉北稅務局僅存兩年)的趙昭回憶，迷信品被列入消耗品和奢侈品範圍，課以100%的重稅。<sup>39</sup>

共產黨在根據地徵收「迷信稅」的經驗，被運用到新佔領的江浙地區。1950年，迷信品製造業、箔莊、香燭紙箔製造、冥器業、廟宇飲食及經懺等收入被列入上海市營業稅，相關從業者需要向上海市稅務部門繳納3%的稅率。<sup>40</sup>不確定1950年代初是否只有上海對經懺收入徵稅。但據筆者考察，1949

<sup>37</sup> Timothy Brooks,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Late-Imperial Origins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Making Religion, Mak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eds. Yoshiko Ashiwa and David L. Wan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23;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139.

<sup>38</sup> 徵收「迷信稅」，並非共產黨首創。早在清末時期江浙地區已經徵收經懺捐。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以經懺捐為代表的「迷信稅」在江浙地區一度頗為流行。王翔，〈從「裁厘認捐」到「裁厘加稅」——清末民初江蘇商民的兩次重要鬥爭〉，《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8.06)，頁49-64；黃運喜，〈民國時期寺廟管理法規的演變〉，弘法寺編，《行願大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頁238(註釋2)；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1912-1949)》(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頁412-416。

<sup>39</sup> 張學恕編，《中國長江下游經濟發展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0)，頁579；李靖莉，《黃河三角洲經濟史研究(1840-1978年)》(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8)，頁163-164；趙昭，《流香「稅」月》(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10)，頁16。

<sup>40</sup> 〈六、七、八月營業部份工商業稅 市政府稅務局公佈適用稅率表〉，《文匯報》(上海)，1950年8月26日，5版。

年後江浙地區僧尼仍有不少僧尼以經懺為生，只是部分寺廟趕經懺的方式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部分十方叢林的佛事變化較大，鎮江句容寶華山和常州天寧寺是代表。1949 年到 1955 年間，寶華山佛事暫時中止，主要原因與該寺舉辦佛事的時機緊密相關。律宗名山寶華山平時不做佛事，只在僧尼受戒期間舉辦水陸法會，<sup>41</sup>以補充人數增加造成的額外開銷。曾在該寺住過四年的德國建築家艾術華(J.Prip Moeller)記載，該寺相當一部分收入來源於戒子繳納的受戒費用和戒期佛教信徒的捐贈。<sup>42</sup>僧眾人數大減，傳戒中斷，一直到 1955 年前都沒有傳戒，也不可能舉辦大型水陸法會。

新政權建立後，常州天寧寺的僧眾仍不時趕經懺、做佛事，但為了生存，不得不改變原有的一些規則或慣例。1949 年以前的民國時代，為了維持禪門祖庭的宗風，天寧寺僧人作佛事不出寺門。<sup>43</sup>1949 年後，寺裡經濟發生巨變。僧人林祥回憶：「1950 年到 1952 年是寺裡生活最為困難的時期，每天只能吃兩頓飯，後來連兩頓粥都吃不上，只能吃點麥磨的麩皮糊粥，就是這種粥，也常常接不上。」<sup>44</sup>由於經濟因素，寺僧不得不打破不出寺門做經懺的慣例，也開始同小廟應付僧一樣，去寺外兜攬佛事。由於佛事需求減少，常州經懺市場的競爭激烈。天寧寺僧人與其他寺廟發生不少爭執乃至衝突，官司打到常州市人民法院。最後法院判處天寧寺每月補貼常州市內各雲水僧眾若干費用，方才平息事端。<sup>45</sup>

原本以佛事為生的小廟，也在經懺減少的情況下，通過結社、限制佛事從業者等方式重新規劃經懺市場。

<sup>41</sup> 關於寶華山水陸法會的詳情，參見霍姆斯·維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下冊，頁 57-58。

<sup>42</sup> J.Prip Moeller, *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ies: Their Plan and Its Function as a Setting for Buddhist Monastic Lif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1), 207.

<sup>43</sup> 專門趕經懺的僧人，在佛教的話語裡有蔑稱的意味。

<sup>44</sup> 金山寺林祥法師口述，周文逸、楊樹慧採訪記錄，〈解放前後的天寧寺〉（1986 年 3 月 15 日），天寧寺檔案館藏。

<sup>45</sup> 雲水僧：無常住寺院，四處雲遊參訪的僧人。〈常州天寧寺歷史資料的編寫提綱（第三次稿）〉（1959 年 2 月 12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8-1959-2-2-50；霍姆斯·維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下冊，頁 83-85。

1950年4月6日，溫州佛教會以「整頓經懺風氣，革除以往陋習」的名義，成立新的清眾會。所謂的清眾會，實際上就是統一規劃佛事的經懺僧聯營組。<sup>46</sup>經懺聯營組決定，將溫州舊有九鎮的經懺僧人分為南集、中落、海壇、蓮廣、東南五組。每組成員只能在轄區內舉辦佛事，不得越界侵奪。如有齋主前來承包經懺，無論時間長短，非本組地段，一律拒絕接洽。請其向經懺小組承辦，不得私自接受。各醫院有臨時佛事需求，歸本鎮地段承接。如本組人數不敷分派，可向別組請派，不得私請鄉間經友。<sup>47</sup>如有違反上述規約，一律罰食米2000斤。<sup>48</sup>無錫市佛教籌委會也重新訂立經懺規則，一方面糾正佛事「商業化」的觀念，通過自我矯正，為經懺的存續提供正當理由；另一方面，禁止在家居士或者住庵居士參與佛事，維護僧尼在經懺市場上的利益。<sup>49</sup>

上海的經懺佛事也發生較大變化。1949年以前的民國時代，上海寺院以提供佛事「一條龍」服務著稱。為齋主舉辦素筵是佛事的重要環節。許多寺院如法藏寺、靜安寺等正是因為素齋辦得好，佛事才格外興盛。<sup>50</sup>對於上海僧人來說，舉辦各種類型的素筵得心應手，開辦人民食堂有經營管理方面的優勢。1949年後，以壽聖庵住持達圓和海會寺住持續可為首，上海佛教界組成「生產節約委員會」。該會成立後即號召各寺院舉辦食堂。<sup>51</sup>受壽聖庵的影響，9月5日下午，上海市35所寺廟的50名代表齊聚該寺，決定推廣「不

<sup>46</sup> 〈改革溫州市佛教經懺的計畫書〉(1950年3月2日)，溫州市檔案館藏，檔號：51-1-33。

<sup>47</sup> 經友：兜攬經懺佛事，非僧非道的在家俗人，有些類似於前文提到的南京齋婆和馬路政客。羅楊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叢書·浙江溫州·鹿城卷》(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6)，頁207-212。

<sup>48</sup> 〈為革除經懺陋習整飭風氣設立清眾會〉(1950年4月25日)，溫州市檔案館藏，檔號：51-1-33。

<sup>49</sup> 曹培靈，〈無錫佛協報告工作情況〉，《覺訊》，第12期(上海，1952.12)，頁16；曹培靈，〈無錫市佛教協會的整教工作開始了〉，《現代佛學》，第1期(北京，1953.01)，頁24。

<sup>50</sup> 釋聖嚴，《歸程》，頁135。

<sup>51</sup> 〈佛門弟子辦食堂〉，《大公報》(上海)，1949年9月14日，3版。

以營利為目的、替大眾服務」的人民飯堂。<sup>52</sup>到 1950 年 1 月，上海市共有 15 所寺院創辦食堂。<sup>53</sup>

上海的佛事和素齋向來相得益彰、相輔相成。1949 年以後，佛事減少，各寺院辦的人民食堂福利性質高於盈利性質，加上 1951 年來物價不斷上漲，寺院食堂一直處於勉強維持的狀態。1950 年初壽聖庵、玉佛寺、護國寺等最初辦理人民食堂的寺院，因盈利艱難，入不敷出，只能關門停業。1952 年，只剩下國恩寺、聖仙寺、法藏寺、普濟寺和莊嚴寺五所寺院的酒菜業尚在經營，前兩所還能正常經營，後三所寺院勉強運轉。<sup>54</sup>

1952 年 1 月，中共發動「五反」運動，旨在打擊私營工商業者「賄賂國家幹部、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五毒」行為。2 月，「五反」運動在江浙地區陸續展開。<sup>55</sup>上海多家寺院的俗家工人紛紛加入酒菜業工會，借工會的勢力，與寺院僧人對抗。1952 年初「五反」運動展開後，酒菜業工會改變寺院俗家工人的工資形式，此舉直接導致寺院素齋業的衰落。中國店員工會上海市委酒菜業工作委員會新出臺〈關於佛教會寺廟素齋業取消外加小帳陋規勞資協議草案〉。〈草案〉規定，為使寺院和工人雙方平等兩利，取消職工收入以小費計算的「陋規」，改為「內扣」。例如，營業額如有 15 萬元，得內扣 5 萬元(1955 年前皆為舊幣，下同)，<sup>56</sup>作為職工工資。<sup>57</sup>此後，不固定的小費變成職工固定提成，寺方經營負擔陡增，不得不以辭退工人減少成本，緩解壓力。1952 年 1 月 27 日，〈草案〉正式實施，上海寺院很快出現了一波解雇工人的高潮。各大寺院與工人協商，參照 1951

<sup>52</sup> 〈佛門弟子走向生產〉，《大公報》(上海)，1949 年 9 月 6 日，2 版。

<sup>53</sup> 〈上海市佛教寺廟舉辦人民食堂一覽表〉(1950 年 1 月 10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B168-1-742-105。

<sup>54</sup> 〈酒菜寺院業情況調查表〉(微縮)(1952 年)，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C5-2-158-125。

<sup>55</sup> 楊穎奇主編，《江蘇通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1949-1978)》(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 82-83。

<sup>56</sup> 1955 年 3 月 1 日，中國人民銀行在全國各地開始發行新人民幣。新人民幣按照 1：10000 的匯率兌換舊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遵照國務院的命令 今起在全國發行新人民幣〉，《人民日報》(北京)，1955 年 3 月 1 日，2 版。

<sup>57</sup> 〈關於佛教會寺廟素齋業取消外加小帳陋規勞資協議草案〉(微縮)(1952 年 1 月 9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C5-2-156-39。

年最高月工資標準，給予三個月薪水作為遣散費。1949年以前的民國時代，滬上以素齋拉動經懺佛事的模式再難延續，僧尼們只能另尋他法。

「五反」運動不僅僅加劇俗家工人與僧人之間關係的緊張，也讓起步不久的僧尼生產事業受到極大影響。創辦手工業工廠是中共初建時引導僧尼轉向勞動生產的一項政策，對城市僧尼來說，也不失為解決經濟困難、實現自養的一條出路。各地僧民大多選擇響應政府號召，嘗試建立各種手工業生產組織。<sup>58</sup>例如，1949年後，無錫僧人金芳和耀明分別創辦了小型的藥品公司。1949年到1951年間，兩家企業每月可分別產出草藥50擔和70擔。「五反」運動開展後，無錫藥業「五反」小組檢舉金芳、耀明偷稅漏稅，兩家企業再難維持，紛紛停業。<sup>59</sup>「五反」運動對僧尼生產事業的衝擊，為後續轉業僧尼重操經懺舊業埋下伏筆。

中共建政後，江南諸多叢林道場、小廟的佛事形式發生較大變化。蘇州靈岩山是少數幾個延續民國的佛事形式，繼續以佛事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維持寺院日常運轉和僧團修行的寺院。

1949年後，滬上僅存的幾個家佛教雜誌《弘化月刊》、《覺訊》和《覺有情》，頻繁宣傳靈岩山開辦農場、僧眾積極參加農業勞動的消息和新聞。學者以這些史料為據，認為靈岩山僧眾徹底轉向生產。<sup>60</sup>僅憑前述幾家佛教雜誌的資訊做判斷，易被誤導。事實上，靈岩山不做經懺、不分眾打七的模式並沒有發生變化。該寺的集體宗教修行從未間斷，由僧團信仰虔誠吸引而來的佛事收入和諸方信徒的供養仍是該寺最重要的經濟來源。

<sup>58</sup> 〈關於常州市宗教情況調查的報告〉（1952年10月22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14-1952-1-2-113；浮天、紅燈、神鐘，〈華東各地佛教徒投入生產熱潮〉，《覺訊》，第4期（上海，1952.04），頁10；心懺，〈蘇州佛教界的新面貌〉，《現代佛學》，第7期（北京，1952.07），頁26-27。

<sup>59</sup> 〈僧金芳結論表〉（1952年），無錫市檔案館藏，檔號：A15-1952-8-353-63；〈僧耀明結論表〉（1952年），無錫市檔案館藏，檔號：A15-1952-8-353-52。

<sup>60</sup> 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頁233-236；Jan Kiely, “The Communist Dismantling of Temple and Monastic Buddhism in Suzhou,” in *Recovering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eds. Jan Kiely and J. Brooks Jessu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216-254.

農業生產十分艱難，產出也並不可觀，但寺裡念佛堂和佛學院等宗教修行部門並未停轉。<sup>61</sup>他們所以能夠繼續維持集體修行生活，主要仰賴於佛事收入和信徒們的捐贈。1928年印光法師中興靈岩山后，寺裡大宗的收入主要靠佛事。1949年前，寺裡每年的佛事和布施是田租的數倍乃至數十倍。<sup>62</sup>1949年後，靈岩山的經濟結構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1949年，靈岩山共有佛事收入1425多萬，各界供養3203多萬元，而農業收入僅有38.5萬。<sup>63</sup>1953年，靈岩山農業產出有所增加，但仍不能滿足180多位僧人的日常開銷。前來參訪的陝北佛教耆宿康寄遙稱，寺中有水田120畝，旱田30-40畝，每年收入不足半年食用，其餘全仰仗佛事及各方資助。<sup>64</sup>

與靈岩山同樣成為特例的是常州部分居士。新政權建立後，常州佛學會主導的居士不僅沒有停止做佛事，還經常打佛七、承接亡者供牌。<sup>65</sup>這種情況很可能和常州居士界領袖、佛學會負責人吳詠笙有關。

吳詠笙原名吳式鑫，1917年曾任武進縣師範學校校長。<sup>66</sup>1949年後，他擔任常州佛學會會長，帶領常州僧尼居士，回應地方政府的號召，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活動。1949年7月受颱風影響，江蘇境內江河猛漲，水災嚴重，蘇

<sup>61</sup> 〈靈岩近訊〉，《弘化月刊》，第7期(上海，1949.07)，頁8；〈靈岩呼籲〉，《弘化月刊》，第8期(上海，1949.08)，頁8。

<sup>62</sup> 蘇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蘇州市志》，第3冊第52卷，頁1134；《靈岩山萬年簿(1926-1949)》，靈岩山寺檔案館藏，無檔號。

<sup>63</sup> 關於1949年貨幣的實際價值，據壽聖庵僧人說，普通七位僧人拜懺一白天的費用是5萬元，一晚要5萬多，一晝夜是10多萬。外出誦經再多加二成。寺院提供的素齋，一份素菜(例如紅燒蘿蔔、白菜豆腐等)、一個湯、兩碗米飯價格800-1000元。也就是說，上海七位僧人連續拜懺四晝夜的收入，即可抵得靈岩山寺1949年全年的農業收入。儀式經濟收入和農業生產收入之差別可見一斑。儀式收入倘若和當時的飛漲的物價相比，則相形見绌。1949年國共政權更替後，上海物價大幅上升，各項日常開支陡增。據上海《文匯報》記載，肥皂和火柴「上漲尤勁」，固本肥皂升到2.6萬，美麗牌火柴則漲到8.9萬，均上升三成和二成。上海僧眾誦經一晝夜只能買到幾盒火柴。參見〈僧道新生參加生產〉，《大公報》(上海)，1949年12月4日，4版；〈肥皂火柴勁升〉，《文匯報》(上海)，1949年6月30日，5版。

<sup>64</sup> 康寄遙，〈瞻禮蘇州靈岩山寺的感言〉，《弘化月刊》，第9期(上海，1953.09)，頁14。

<sup>65</sup> 〈召開宗教界上中層人士會議記錄(有關佛教中的教產和組織整理問題)〉(1958年8月20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6-3-19。

<sup>66</sup>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武進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武進文史資料》(自引本，1987)第8輯，頁90。

北地區更甚。據統計，全區 35 個縣有 28 個受災，災民缺衣少糧，生活極為艱難。1950 年，江浙再逢大水災，災民無力應對，悄然而至的寒冬令災情雪上加霜。毛澤東、周恩來電告蘇北行政公署，要求儘快救濟災荒。蘇北區黨委指令各界緊急勸募寒衣，並成立蘇北各界勸募寒衣委員會。蘇南、浙江各地紛紛響應。<sup>67</sup>10 月，吳詠笙與武進商會會長查秉初、民報社社長顧嶠若、經理張煥文、佛教會代表僧人靈光等組成勸募寒衣委員會，總計募得寒衣 950 多件，善款 18 萬元，超額完成勸募任務，得到常州政府的讚揚。<sup>68</sup>1951 年 3 月 19 日，常州佛教界舉行抗美援朝遊行示威大會，已經 70 歲高齡的吳詠笙拄著拐杖參加遊行，被半官方性質的《現代佛學》雜誌高調報導。<sup>69</sup>吳積極配合常州政府的各項運動，在佛教界具有較高的社會影響力，遂成為常州宗教界上層統戰對象，<sup>70</sup>他領導的常州佛學會因而獲得更多的活動空間。從 1949 年常州佛學會成立到 1958 年 9 年間，常州佛學會並未向政府有關部門登記，自行按照甲乙丙丁四個等級向會員收取會費，入會的居士和常州的僧尼道士一起從事各種經懺佛事活動。<sup>71</sup>

佛事減少給佛事和僧尼的生活帶來許多變化，寺院大多經濟狀況堪憂，宗教修行被日常謀生取代。當然，這也只是 1949 年到 1952 年間江浙地區佛教的一個面向。另一方面，中共管理宗教較為實際，並沒有徹底取締佛事。政府既要壓縮佛教設施的空間，又要承認信教自由，實際上是在現行政策與意識形態產生張力之後尋求一種平衡。政府的現實考量，固然限制了佛教活動，但也給佛事活動留下了一些餘地。

<sup>67</sup>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蘇省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第 70 卷，頁 478、487-488；杭州市民政局編，《杭州市民政志》（杭州：杭州市民政局印，1993），頁 203-204。

<sup>68</sup> 斯雨，〈常州一年來佛教動態的報告〉，《覺訊》，第 2、3 期（上海，1951.03），頁 22。

<sup>69</sup> 了願、靜海，〈常州市佛教徒抗美援朝反對美帝武裝日本示威遊行大會特寫〉，《現代佛學》，第 4 期（北京，1951.04），頁 34。

<sup>70</sup> 〈關於召開宗教界中上層認識聯誼座談會計畫（草稿）〉（1957 年 2 月 26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6-3-19-12。

<sup>71</sup> 〈召開宗教界中上層人士會議記錄（有關佛教中的教產和組織整理問題）〉（1958 年 8 月 20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6-3-19。



中央對佛事的指示，在地方得以落實。1951年，溫州市佛教協會提出改造經懺的計畫，市政府認為這是佛教內部的事情，不予干涉。僧眾團體出現佛事糾紛上告政府，政府雖然不贊同此種「迷信」行為，但「體念該民等一時不能改變，姑置勿論。」<sup>72</sup>

除了宗教政策和地方落實過程中有意無意留下的空間，就像維慈所說，我們絕不該將中國的僧眾想做毫無能動性的木偶人，只能在時代的巨變中逆來順受。正相反，他們善於抓住時機，利用一切機會重操舊業。<sup>73</sup>1952年9月，隨著世界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以圓瑛在上海圓明講堂發起的水陸道場為起點，江浙一帶的佛事活動經歷了一輪短暫的高潮。

#### 四、1953：經懺佛事短暫的興盛

1952年3月，彭真、宋慶齡、陳叔通等人開始籌備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辦的第一個國際性會議。<sup>74</sup>會議代表主要來自於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許多國家深受佛教文化影響，中國的知名佛教徒也受邀列席。上海圓明道場的住持圓瑛就是代表之一。<sup>75</sup>圓瑛借著這個身份和機會，以「祝願世界和平」為題，組織了一場大型的水陸講經法會。法會實際上是為了全國各地經濟困難的名山古剎籌集道糧。<sup>76</sup>

這次法會的會期較長，從農曆八月初一至九月十九日，持續49天。與會人數較多。平日講經，平均每天到會聽眾800人。逢星期日「觀音誕辰」、

<sup>72</sup> 〈改革溫州市佛教經懺的計畫書〉(1950年3月2日)、〈為故意破壞民主集中協約聯請迅賜喚案說服以維民主團結事〉(1950年7月7日)，溫州市檔案館藏，檔號51-1-33。

<sup>73</sup> 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 266.

<sup>74</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第2卷(1949-1956)，頁739-741。

<sup>75</sup> 〈圓瑛大師被選為亞洲和平會議的中國代表〉，《弘化月刊》，第9期(上海，1952.09)，頁16。

<sup>76</sup> 〈圓瑛大師維護名山古剎道場啟建水陸法會〉，《弘化月刊》，第8期(上海，1952.08)，頁16。

「皈依日」等，到會的人數能在 1500 人以上。期間有三天為「皈依日」，「受皈依者」共有 1787 人。<sup>77</sup>

法會進賬頗為可觀。收入來源分為幾種，供奉牌位的收入是大宗。牌位分甲乙丙丁、冥戒等五種。各收報名費 20 萬元、10 萬元、5 萬元、2 萬元、1 萬元、5000 元，共有 13571 個牌位。另有功德、普佛、福田券、大供會等 11 種項目，共獲得 6.76 億元。刨除各項供品、參會人員餐費、做佛事的僧尼單金等開支(3.26 億元)，還剩 3.5 億元。<sup>78</sup>剩餘錢款，由圓瑛、明暘、妙真、居士李經緯、鄭頌英等 41 人組成「法會分配委員會」，將全部所得分配給四大名山(浙江普陀山、山西五臺山、安徽九華山、四川峨眉山)、八大明剎(寧波天童寺、福州鼓山寺、寧波阿育王寺、寧波觀宗寺、揚州高旻寺、寧波七塔寺、蘇州靈岩山寺、福州地藏寺)及上海、浙江、江蘇、北京等地前來祈求幫助的佛教信徒。按名單分配後，法會所剩餘的 3.5 億元，尚缺少 120 多萬元，這部分由圓明講堂供養。四大名山和八大明剎分別獲得 6300 萬元和 1.085 億元，占總數的 18% 和 31%。上海市佛教徒獲得 3300 萬元，占 9.4%，來信要求救濟者獲得 1.104 億元，占 31.5%。<sup>79</sup>

此次法會在中國當代佛教史上的意義重大。它不僅是 1949 年以來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法事活動，還在三個層面產生重要影響。

首先，它有效緩解叢林道場的經濟困境，使很多僧眾能夠繼續安心修行。1953 年 3 月 16 日，上海佛教青年會為籌集高旻寺道糧，又啟建一場佛七，

<sup>77</sup> 〈關於圓明講堂法會的復函〉(1953 年 3 月 7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A33-2-650-4。

<sup>78</sup> 1952 年 12 月，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大致為 1 美元=2.617 萬人民幣。1952 年 3 月中國各級人民政府工作人員每人每月的花銷標準大致分為十等二十四級。最高一級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每個月開支標準 386.42 萬元，最低等第二十四級勤雜人員每月開支標準 18.32 萬元。1952 年訂購上海《弘化月刊》全年的價格為 2 萬元。按照上述數據計算，此次法會的總收入等於最高級幹部中央政府主席 1.25 年的工資，最貴的牌位價格相當於政府第二十四級幹部(勤雜人員)一個多月的工資。參見栗志剛，〈人民幣匯率制度演變的政治分析〉(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博士論文，2007)，頁 32；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 1 冊，頁 436-437。

<sup>79</sup> 圓瑛，〈圓明講堂水陸道場講經法會收入支出〉，《弘化月刊》，第 1 期(上海，1953.01)，頁 16；〈關於圓明講堂法會的復函〉(1953 年 3 月 7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A33-2-650-4。

迎請虛雲、應慈、來果、清定等佛教高僧講經開示，共募款 4600 萬元，悉數供養高旻寺僧。<sup>80</sup>靠著圓明道場和上海佛教青年會的捐助，高旻寺的僧眾才能繼續維持每天 7-15 個小時的禪坐修行。<sup>81</sup>

圓明道場水陸法會之後，上海佛教界以法會或者刊登啟事的形式為全國各大叢林道場募款的形式得以沿襲。1953 年，五臺山清涼寺、廣濟茅棚、古南台三處僧眾 116 人，缺少過冬的糧食和燃柴，加上興修廟宇的欠款，急需 4100 萬元。上海六個佛教團體(金剛道場、上海佛教青年會、世界佛教居士林、功德林佛學會、上海佛學會、佛教闡化法會)聯合發起通知，希望各地佛教徒供養三寶。<sup>82</sup>1954 年 3 月 14 日，共收到捐款 7417 萬元，順利解除五臺山僧眾的困境。<sup>83</sup>

其次，這次法會起到良好的示範作用，讓國際社會和國內少數民族代表相信中共政權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法會期間，亞洲和平代表等國佛教徒、印度乒乓球代表團、西藏致敬團和昌都地區觀禮團等紛紛前來參觀。人頭攢動的熱鬧氛圍，如法執行的宗教儀式讓他們大為震撼，打破了「中共消滅宗教」的傳言。<sup>84</sup>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圓明道場水陸法會引發的連鎖反映。此次法會之後，江浙一帶佛教徒紛紛以「祝願世界和平」的名義，開展各種形式的佛事活動。

圓明講堂水陸道場舉辦後，上海玉佛寺住持葦舫迅速在該寺組建為期 49 天的水陸法會，迎請名僧虛雲來滬主持。此次法會除了在佛教刊物上刊登廣告外，還在上海幾家知名報刊《大公報》、《新聞報》等連續數日刊登啟事，規模較圓明講堂法會更大。據統計，平均每天前往觀禮的信眾和觀眾 3000 人，整個法會期間參加者約有 15 萬人，皈依虛雲者 14123 人。法會共收入

<sup>80</sup> 上海佛教青年會，〈本會舉辦釋迦佛七 籌募高旻寺道糧 服務部代收醫藥供養的捐款〉，《覺訊》，第 4 期(上海，1953.04)，頁 15。

<sup>81</sup> 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 63-64, 494.

<sup>82</sup> 〈報告一個如法供養三寶的好消息〉，《弘化月刊》，第 8 期(上海，1954.8)，頁 20。

<sup>83</sup> 五臺山供養功德會，〈五臺山供養功德會第一屆募捐告一段落〉，《弘化月刊》，第 3 期(上海，1954.03)，頁 18。

<sup>84</sup> 〈關於圓明講堂法會的復函〉(1953 年 3 月 7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A33-2-650-4。

6.329 億多元，玉佛寺將大部分錢款用來購買寺中所需物資，剩餘錢款按虛雲的主張捐贈給各大叢林道場。<sup>85</sup>

1953 年 2 月以後，上海市佛教界積極效仿圓明講堂和玉佛寺，又有八個寺院舉行多種佛事活動。<sup>86</sup>玉佛寺法會結束後，1953 年農曆二月，蘇州佛教徒迎請虛雲赴蘇弘法。蘇州法會召開時，各地前來觀禮的佛教徒人數甚眾，前後高達 10 萬人。其中有 3000 多人皈依老和尚，每人繳納 1 萬元供養金。入會民眾最多時達到 1 萬人。廟內裝有麥克風，對遊覽民眾播誦經義。<sup>87</sup>

常州市佛教界效仿上海，也在這年 2 月 28 日到 3 月 9 日，召開和平法會。會上迎請多位名僧宣講佛經，並作水陸道場。常州的水陸道場更能反映佛教徒如何小心翼翼地政治表態與信仰行為之間尋求平衡。一方面，他們請政府派員指導法會，在佛殿放置常州革命烈士的牌位，為其祈禱超度。<sup>88</sup>法會第三天，傳來史達林去世的消息。法會負責人立刻組織全體信徒和觀眾佩戴黑紗，為史達林默哀五分鐘，並召開追悼大會。<sup>89</sup>另一方面，佛事活動如火如荼。主講人守培、茗山講法時期，與會聽眾高達 1 萬多人。冶光、果如、隆福、洪德等僧人負責宣教工作，每天宣講《現代佛學》、《覺訊》上刊載的佛教論文，會期中守培一人就收了 200 多位徒弟。<sup>90</sup>

常州和平法會營造了較為寬鬆的宗教氛圍，各寺院的佛事活動日漸增多。1952 年，清涼寺每月佛事不到十堂，1953 年舉行法會後數月裡，每月平

<sup>85</sup> 〈上海市佛教界祝願世界和平法會收支賬略〉，《弘化月刊》，第 4 期(上海，1953.04)，頁 16；〈關於圓明講堂法會的復函〉(1953 年 3 月 7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A33-2-650-4。

<sup>86</sup> 〈關於圓明講堂法會的復函〉(1953 年 5 月 3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A33-2-650-4。

<sup>87</sup> 〈關於處理最近佛教活動中混亂情況的指示〉(1953 年 5 月 5 日)，溫州市檔案館藏，檔號：87-5-80；《蘇州市志》，第 3 冊，頁 1125。

<sup>88</sup> 佛教儀式，僧尼通過誦經拜懺救度亡靈，助其重生善道至解脫。參見陳兵編著，《新編佛教辭典》(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4)，頁 312。

<sup>89</sup> 〈常州市佛教徒召開和平法會的情況報告〉(1953 年 3 月 24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14-1953-1-3-164。

<sup>90</sup> 〈各地佛教動態簡訊〉，《現代佛學》，第 4 期(北京，1953.04)，頁 27。

均增加到五六十堂。<sup>91</sup>兩寺身殘的年老僧眾組織念佛團，以此獲得一些進項。他們以「往生無罪」的名義動員信徒寫佛名法名，按照牌位大小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為 8 萬元，陸續遞減到 2 萬元，並規定上半年和下半年必須供奉同等價格的牌位。<sup>92</sup>

許多傳統的佛教活動得以恢復。常州素有地藏、觀音香期，1949 年後一度中斷。佛教法會的舉行重新啟動佛事活動，常州民眾又恢復了中斷數年的佛誕「坐夜」。<sup>93</sup>這些佛事活動為寺僧帶來較多的收入，平均一次即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元的進項。<sup>94</sup>

亞洲和太平洋和平會議不僅促成各地的佛教法會方興未艾，也為全國性佛教組織的創設提供契機。1952 年 11 月 4 日至 5 日，虛雲、巨贊、趙樸初等佛教界知名人士齊聚北京廣濟寺，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領導下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籌備委員會。1953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3 日，中國佛教協會正式成立。全國佛協的成立，為困頓的中國佛教界注入一劑強心劑。<sup>95</sup>江浙一帶很多佛教徒開始籌組地方佛教協會。江蘇如東縣、松江縣、南匯縣等地僧眾自動集會，商議成立佛協組織和蓮社，定期念佛。全國和地方佛協的成立，又反過來促進佛事活動的興盛。鎮江萬佛寺為慶祝佛教協會成立舉辦大型法會，鎮江藥師庵慈渡和尚也以軍屬名義出面舉行法會。<sup>96</sup>

這一段時間佛事興隆的原因，不只有佛教影響力的提升，還有自然災害和氣象異常引發的謠言和民間騷動。天災和謠言導致的集體恐慌，引發人們到宗教中尋求安慰。

<sup>91</sup> 〈常州市佛教動態及存在問題〉(1953 年 5 月 29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3-2-9-57。

<sup>92</sup> 〈常州市佛教動態及提出幾點意見〉(1953 年 8 月 21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3-1-4-64。

<sup>93</sup> 坐夜：在某個宗教節日前夜，整夜坐在寺院裡誦經念佛。王棟等主編，《民俗論叢》(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 126。

<sup>94</sup> 〈常州市佛教動態及提出幾點意見〉(1953 年 8 月 21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3-1-4-64。

<sup>95</sup> 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頁 438-444。

<sup>96</sup> 中共江蘇省委統戰部，〈全國佛教協會成立各地僧尼活動，各地必須注意掌握〉(1953 年 7 月 16 日)，無錫市檔案館藏，檔號：A5-1953-2-7-18；宋國清，〈各地紛紛成立佛協並辦法會〉，《覺訊》，第 12 期(上海，1952.12)，頁 11。

1953年，江浙地區災害頻仍，陸續發生春旱、颱風、洪水、蝗蟲等四大災害。<sup>97</sup>新華社華東分社報導，根據1953年4月上半月的不完全統計，華東區已經有災民1657萬人，以安徽、江蘇、山東三省為重。江蘇省有災民470多萬人，其中斷炊達148萬人，比2月份增加了15%。個別地區已經發生逃荒、討飯、出賣兒女和自殺事件，江蘇省有六位災民自殺。<sup>98</sup>上半年春荒還未結束，入夏以後，句容、江都、浦口一帶又因連日暴雨發生水災。農田、房屋被毀嚴重。沿海沿湖地區農民受颱風影響，生活生產格外困難。<sup>99</sup>緊接著春寒和夏洪，江蘇省又面臨秋蝗的新災。<sup>100</sup>

自古災疫不分家。受自然災害影響，1953年江蘇省爆發多種類型的疫病。全省血吸蟲病患者人數超過200萬。蘇南的青浦、松江、昆山、嘉定等地區患者占當地總人口的90%。血吸蟲病死亡率高，還導致生殖率下降。1950年，高郵縣有1000多人死於此病，兩年之內只生了九個小孩。除了血吸蟲病，泰州地區還流行麻瘋病，1952年底，六合、泰興、高郵、南京、灌雲等地又現麻疹和天花。<sup>101</sup>

自然災害發生和疫病流行，患病人數眾多。1953年，《宣傳通訊》上刊載：

入春以來(1953年)，不少地區(如安徽、江蘇、浙江、河南、湖南、廣東、山西、熱河、四川等省及上海、天津市郊)的一些農村城鎮均連續發生群眾性的求神拜佛事件。這類事件大多是由發現所謂「仙水」、「神仙顯聖」及其他「治病消災」的迷信謠傳所引起……這種現象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今春許多地方都發生自然災害(其中如安徽、江蘇等省的

<sup>97</sup> 王良佑，〈華東區水、旱、風、蟲災情況〉，《內部參考》(出版地不詳)，1953年8月3日，頁2-3。

<sup>98</sup> 王良佑，〈華東區的災荒情況〉，《內部參考》(出版地不詳)，1953年5月9日，頁104-105。

<sup>99</sup> 邵瓊，〈江蘇省句容等地發生水災〉，《內部參考》(出版地不詳)，1953年7月2日，頁22；王良佑，〈華東區的災荒情況〉，頁104-105。

<sup>100</sup> 邵瓊，〈江蘇省發生秋蝗〉，《內部參考》(出版地不詳)，1953年8月3日，頁3。

<sup>101</sup> 新華通訊社，〈江蘇省各地疫病情況嚴重〉，《內部參考》(出版地不詳)，1953年2月3日，頁30-31。

災情極重)和春荒，許多災民已經斷炊。同時春季疫病流行，群眾患病的很多。<sup>102</sup>

政府的衛生設備和醫療工作卻無法滿足災民的需要，已經融入歷史傳統和文化記憶的超自然崇拜，在中國社會源遠流長，構成民眾日常生活的內容之一。蘇南血吸蟲患者所在地，恰與該地區「仙水」民眾事件發生地吻合。

民眾對神異現象的追逐，也為部分僧尼樂見。各種佛事活動與人們對超自然現象的恐懼和信仰緊密相關。神職人員又有意無意助長這類傳言的散播。蘇州僧人隆遇、鎮江僧人慈渡在鎮江的佛教法會上說：「現在是一個五災的時候(兵、火、水、饑、瘟)，是作孽受罪的世界，大家一心念佛，趕快求生西方」；「美國細菌戰，只要多念經就不用怕。」如皋定慧寺舉行法會，東至濱海，北至鹽城，西至泰州，南至蘇南，各地都有民眾前往敬香。最多時一天達三萬餘人。會有佛教徒說：「十三歲的姑娘上了天，在天上跑了許多地方，看見天上堆了許多糧食，有一個老頭看守，很多天神地將開會說：『下面節約不燒香，我們也節約使他們荒年。他們欠我香燭，我就收他們五穀。』」法會之後，此種言論一度傳遍鎮江、丹徒、句容各地。<sup>103</sup>這些謠言推動民眾投向宗教的懷抱尋求安慰。傳言廣為流傳時，各地民眾紛紛到寺院做佛事。

一次法會的收入，抵得過幾個月甚至全年的生產性收入。佛事活動增多直接促使許多已經轉入生產的僧尼重操經懺舊業。常州僧眾決定以後農曆七月十五(中元節)、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薩誕辰)等佛教節日，都要召集法會，給佛像開光，邀集信徒坐夜。從事生產的部分僧眾見有佛事可做，漸漸對勞動生產不再積極，重新回到廟中做佛事。<sup>104</sup>

<sup>102</sup> 〈慎重處理群眾性的迷信活動事件〉，《宣傳通訊》，第17期(出版地不詳，1953.05)，頁26-29。

<sup>103</sup> 〈關於處理最近佛教活動中混亂情況的指示〉(1953年5月5日)，溫州市檔案館藏，檔號：87-5-80。

<sup>104</sup> 〈常州市佛教動態及提出幾點意見〉(1953年8月21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3-1-4-64；〈常州市宗教工作十年史(初稿)〉(1959年4月)，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8-1959-2-20-27。

佛教影響力的上升和佛事的興旺也引發一些問題。中共政權對佛教的改造，把僧尼從事勞動生產放在更為重要的位置，強調對不願勞動的僧尼「使他們知道不勞而食的可恥」。<sup>105</sup>已經參加勞動生產的僧尼重操經懺，無疑與政府用生產勞動改造僧團的長遠目標相抵觸。

盛大的佛教法會還同國家意識形態抵牾，引發一些民眾對政府既宣傳「無神論」，又允許僧人從事經懺的疑慮和不滿。1952 年底，上海圓明講堂和玉佛寺舉辦水陸道場時，上海市一些區委接到電話，有的工人打來問責，有的民眾因為法會要買香花券(即門票)，皈依法師要收費，頗有意見，發牢騷說：「出家原來只要錢」、「有錢廟門開」。<sup>106</sup>1953 年圓瑛因病從上海回寧波天童寺修養，附近小廟裡的僧人說：「現在宗教信仰自由了，過去敲掉的寺廟都要修好。敲掉的菩薩都要塑好，誰敲誰負責。」這些話引起部分民眾的恐慌。圓瑛法師回天童，隨行有 20 頂轎子，天童僧人按照規矩放炮迎接，排場肅穆盛大。天童所在的少白鄉幹部和積極分子普遍不滿，認為「上級對和尚抬的太高了」。對圓瑛不十分瞭解的青年農民和積極分子有同樣感覺，不懂為什麼「這群過去依附反動勢力、剝削民眾的資產階級尾巴，現在政府反而要待他們這麼好？」<sup>107</sup>

佛教影響力上升後，許多僧尼要求發還被佔用的寺院房屋或者重修廟宇，直接導致既得利益者和僧尼的衝突。常州青山寺廟房早被小學佔用，佛像損壞。1953 年常州和平法會召開後，青山寺住持無愚對鄉幹部說：「過去政府犯錯誤現在還犯嗎？同意搬回不同意搬回你考慮。」很快有信徒到城市雕塑三個菩薩，夜間敲鑼打鼓迎回青山寺。常州戚墅堰區寺廟多被糧食局倉庫佔用，小和尚戒悟多次向中央和江蘇省控告，威脅再不給房子，「他們要革命了。」<sup>108</sup>

<sup>105</sup> 〈關於漢民族中佛教問題的指示〉(1951 年 6 月 12 日)，頁 1941-1942。

<sup>106</sup> 〈關於圓明講堂法會的復函〉(1953 年 3 月 7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A33-2-650-4。

<sup>107</sup> 〈關於圓瑛和尚來天童寺療養的簡報〉(1953 年 7 月 3 日)，鄞縣區檔案館藏，檔號：5-2-1953-1-8。

<sup>108</sup> 〈華僑、宗教、民族事務工作會議〉(1953 年 6 月)，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6-3-19。



佛事活動引發的一些突發性社會事件，引起當局的警覺和不安。1953年，南匯、震澤、吳縣等地民眾為求佛經，發生民眾性騷動。部分信徒搶奪區人民武裝部長的武器，並毆打區委書記。<sup>109</sup>常州天寧寺、清涼寺念佛坐夜，動輒數百人，各種成員都有，為了維持秩序，常州市政府不得不請派出所、人民服務隊、治安保衛組派員參加。這種「似乎保護他們念佛拜懺」的形象，讓這些政府人士頗為尷尬和不滿。<sup>110</sup>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1953年佛事活動示威。隨著1953年底統購統銷制度的實施，民眾出售餘糧的任務加重，經懺需求者無力支付佛事費用，經懺市場進入相對波折的狀態。

## 五、所有制變革中經懺佛事的起伏(1954-1958)

1953年江蘇各地開始落實中央政策，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江蘇出現了一些問題。1954年春天，江蘇先後經歷春旱和夏洪，有90多萬畝土地被淹，受災嚴重，糧食大幅減產。災民數量高達650萬人，重災災民400多萬人。因為缺糧，有些災民把政府發放的豬飼料當作口糧；有的災民連續六七天不得不以野生動物、蛤蟆、野菜充饑；有的災民餓得臥床不起，不能生產。江寧縣高橋門鄉災民侯義恩靠賣娃的12萬元勉強度日。宰殺變賣牲畜的現象也在各地普遍發生。淮陰高潤區12個鄉有3170頭耕牛，賣出和病死510頭。<sup>111</sup>災情嚴重，江蘇省卻下達了較高的徵糧任務。為了完成徵購任務，一些農民的口糧也被幹部搶走。<sup>112</sup>這段時間，常州、蘇州、無錫等地佛事活動大幅度減少。

<sup>109</sup> 〈關於處理最近佛教活動中混亂情況的指示〉(1953年5月5日)，溫州市檔案館藏，檔號：87-5-80。

<sup>110</sup> 〈常州市佛教動態及提出幾點意見〉(1953年8月21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3-1-4-64。

<sup>111</sup> 魏文華，〈江蘇省災民外逃求生的現象已在三十多個縣中發生〉，《內部參考》(出版地不詳)，1954年11月22日，頁281-282。

<sup>112</sup> 楊穎奇主編，《江蘇通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1949-1978)》，頁118-120。

當江蘇的佛事迅速減少，浙江的各種經懺、法會卻不減繁榮。據寧波地委統戰部和寧波專署公安處報告，1954年開春以來，寧波、杭州、台州、紹興、金華、定海等地區部分佛教徒的佛事活動多樣而頻繁，有開壇講經、傳戒收徒、塑佛開光、廟會等等。尤其以鎮海、奉化和慈溪三縣的大型「香會」為最。<sup>113</sup>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地方幹部的參與。

寧波的情況和汪小煊研究的溫州瑞安縣不同。汪小煊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瑞安縣的宗教仍能存在並在民眾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是新政權曖昧不明、遊移不定的宗教政策，既讓具體執行政策的地方幹部感到困惑，也給他們處理具體問題時留下操作空間。<sup>114</sup>他關注到瑞安地方幹部個人的宗教信仰對地方宗教活動的影響，這點使人深受啟發。但是，本文認為地方幹部執行宗教政策時的曖昧性不僅僅源於模糊的宗教政策和個人信仰，也有很強的經濟動機。法會上的收入抽成是地方政府增加稅收的重要方式。

1954年，奉化等地地方幹部對佛教法會的配合並非首創，而有先例。1953年奉化梅山尊頂寺佛像開光，曾舉辦盛大法會。政府也從僧眾賣牒的收入中抽取不少的稅收。<sup>115</sup>當時沒有參加梅山佛像開光，而是加入「迎龍神」抗旱隊伍的民眾對地方幹部說：「和尚可以拜佛，我們就可以請龍。和尚宗教信仰自由，我們也是宗教信仰自由」，「梅山頭開光你們政府有收入(牒的稅收)，就允許。我們請龍政府沒有收入，就不允許。那麼我們湊點鈔票，交給你們

<sup>113</sup> 〈關於當前農村宗教迷信活動情況報告〉(1954年6月1日)，景寧縣檔案館藏，檔號：5-2-2。

<sup>114</sup> Xiaoxuan Wang, "The Dilemma of Implementation: The State and Relig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90," in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s.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60-261, 268-274.

<sup>115</sup> 此處的「牒」和證實僧人身份的戒牒、度牒不同，又被成為鬼牒，類似於冥府通行證，也叫冥途路引。興起于明朝，是明朝實行路引的冥間版本。寧波寺廟賣牒頗為盛行。一般認為，鬼牒只有蓋了寺院的印章才有效力。寧波北侖有傳說：一個木匠背著寺院私自賣牒給香客，後來暴病臥床，直到追回「假牒」方才痊癒。參見吳康主編，《中華神秘文化辭典》(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頁246；〈鄞山寒色〉，《申報》(上海)，1887年12月19日，2版；羅楊、唐佩娟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叢書：浙江寧波北侖卷》，頁93-95。

政府好了。」<sup>116</sup>可見，地方政府能夠從中牟利是 1954 年廟會盛行非常重要的原因。

1954 年延續了 1953 年盛況。清明節前後，寧波民眾素有朝山進香的習俗。雪竇寺、靈峰寺是寧波地區有名的寺院，成為許多信徒進香的首選。1954 年農曆三月初三是 38 年一次的「正清明」，<sup>117</sup>大多數民眾認為機會難得，對進香抱持很高期待。僧眾自然也不會錯過這個賺錢的機會。清明節前，雪竇寺僧人雲峰和靈峰寺僧人金芳邀集寧波各地僧眾數十人，接洽 49 堂焰口，<sup>118</sup>每堂 35 萬元。兩寺僧人還與上海、杭州各地旅行社聯繫，請其幫忙拉攏遊客。除了招攬經懺焰口，三地僧眾廣泛制「牒」蓋「印」，以供香期時民眾買賣。每張牒收費三千、五千、一萬元不等，「蓋印」收費三千、五千不等。賣牒收入不完全歸僧人所有，政府要從中抽取不低的稅收。例如，一張價格 5000 元的牒，地方政府可抽成 2000 元。

為了讓香會順利舉辦，雪竇寺和靈峰寺的僧人提前聯繫一部分村幹部和民兵，請其在廟會時「幫忙」。這裡的「幫忙」頗為微妙，一方面肯定有讓幹部「高抬貴手」，不予阻止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希望民兵屆時能夠幫助維持秩序，以免發生騷亂，引起政府的不滿，以致未來的廟會無法正常舉辦。

得到地方幹部的默許，清明三天香會促成了一個經濟小高潮，僧眾、小販和被「拉攏」的幹部民兵收入不菲。廟會期間，三處寺廟客流量達到五六萬人，賣牒蓋印數目巨大，寺廟香金和地方政府抽成頗多。保守估計每人花費 4 萬元，三天共消費 20 億元以上。按照當時的物價，這筆錢可購買 200 萬斤大米，12000 擔化肥。附近許多農民暫時放下春耕，跑到山上來抬轎，據說：「抬一次轎子，本月生活就有著落了。」供坐夜香客使用的一小束稻草，最高可以賣到 500 元。香會讓小販大賺一筆。負責維持秩序的民兵也趁機「撈了一把」。39 個民兵中，有 20 多人獲得寺院 10 萬到 60 萬的回扣。除了經

<sup>116</sup> 〈關於抗早運動中群眾的迷信活動情況及與佛教徒活動的關係問題的調查報告〉（1953 年 8 月 30 日），奉化縣檔案館藏，檔號：6-1-1。

<sup>117</sup> 此處應該指農曆和陽曆的清明節是同一天。

<sup>118</sup> 焰口，佛事的一種。據佛教典籍記載，焰口是惡鬼「面然」的別稱，是惡鬼中最苦的一類，常年忍受饑餓、乾渴之苦。後發展為一種施捨食物的佛教儀式。

濟收入，廟會の後續影響力較大。靈峰寺廟會之後，鎮海大溪區境內 50 個小廟，70% 都恢復了經懺佛事。<sup>119</sup>

1955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調整了農村統購統銷政策，降低 1955 年 7 月到 1956 年 7 月的徵購任務，並制定「定產、定購、定銷」的方法，略微減輕了農民的繳糧重壓，<sup>120</sup>這為江蘇經懺市場的復蘇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條件。1955 年，常州有 6000 多人到天寧寺、清涼寺誦經坐夜。1955 年 1 月份起，常州地區有不少齋主向寺院登記法事，每天的收入超過三四十元(1955 年後皆為新幣)。<sup>121</sup>1956 年春節前後，常州佛事驟增。一個普通的小和尚一個月也能有八九十元的收入，齋主多為工人。清涼寺 31 堂佛事中，有 30 堂來自工人。<sup>122</sup>

1956 年 9 月 15 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八大」會議批評了各種官僚主義現象，再次強調繼續團結宗教界愛國人士的方針。<sup>123</sup>「八大」召開前後相對寬鬆的社會氛圍惠及宗教界。除了國內整體政治氛圍外，1956 年佛教外交的作用異常重要。1955 年 4 月 18-25 日，著名的亞非「萬隆會議」召開，總理周恩來代表中國出席。周恩來利用其出色幹練的外交手段更新了亞非國家對中國的認識。<sup>124</sup>許多亞洲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

<sup>119</sup> 〈關於當前農村宗教迷信活動情況報告〉(1954 年 6 月 1 日)，景寧縣檔案館藏，檔號：5-2-2。

<sup>120</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上卷(修訂本)，頁 282。

<sup>121</sup> 1955 年 3 月 1 日，開始發行新人民幣。新舊幣兌換比率 1：10000。新幣施行後，美元和人民幣的兌換率為 1：2.4675。1955 年 10 月上海蓮花寺和龍華寺一個月的素齋收入分別是 88.5 元和 249.7 元。常州天寧寺兩天的佛事收入相當於上海蓮花寺一個月的齋飯收入。參見栗志剛，〈人民幣匯率制度演變的政治分析〉，頁 32；〈關於天寧寺情況的調查報告〉(1955 年 4 月 26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14-1955-1-5-219；〈上海市酒菜商業同業公會籌備會會員調查表：蓮花寺〉(1955 年)，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S323-4-21-165；〈上海市酒菜商業同業公會籌備會會員調查表：龍華寺〉(1955 年)，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S323-4-22-114。

<sup>122</sup> 〈關於華僑、宗教工作檢查情況報告〉(1956 年 12 月 1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6-3-19-56。

<sup>123</sup>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份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 348-350。

<sup>124</sup> 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周恩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 239。

家都有信奉佛教的傳統，在建立和改善同亞非國家關係方面，佛教顯示出獨特的作用。萬隆會議後，中國和南亞諸國展開一系列佛教徒互訪交流活動。<sup>125</sup>

由於國內政治氛圍的放寬，對外關係的需要，各地政府制定宗教政策和處理宗教事務都相對寬鬆和溫和。江蘇省政府宗教事務管理部門不僅放寬「合法宗教活動」的界限而且規定不能幹預正當的宗教活動。<sup>126</sup>官方內部刊物還刊登了不少批評地方幹部違反宗教政策的文章。

1957年5月10日，中宣部在內部刊物《宣教動態》上通報「江浙某些地區嚴重違反宗教政策」。報告提到：「中央統戰部反映，南京、鎮江、常熟、揚州、南通、蘇州、杭州及上海等8個城市，違反宗教政策現象相當嚴重。」<sup>127</sup>受到批評之後，江蘇省政府更加關照佛教徒的個人生活。1957年4月，江蘇省宗教事務局制定了較為詳細的名僧補助計畫，將江蘇省境內需要補助的僧人劃分為四類予以經濟補助。農村中的老弱僧尼被納入農業社，按五保戶原則予以照顧。<sup>128</sup>

官方主動關照外，江蘇各地僧尼的主動性也相應提高，討還廟產的事情日益增多。南京市佛教會對多處被占廟產提出異議。<sup>129</sup>6月26日，作為佛教界代表，南京佛教會副秘書長雞鳴寺住持宗誠參加了南京市政治協商組織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座談會」。會上，她對南京雨花臺區多所被佔廟產的歸屬問題表達了不滿。會後，雨花臺區的幹部們主動承認「以往工作中對政策解釋不夠，態度生硬未能照顧到宗教界人士情緒之處，在此次學習中已經

<sup>125</sup> 〈歡迎中國佛教訪緬代表團的歸來〉，《現代佛學》，第6期(北京，1955.06)，頁1；新華通訊社，〈印度文化代表團在西安參觀興教寺大雁塔〉，《現代佛學》，第7期(北京，1955.07)，頁28。

<sup>126</sup> 〈省1956-1957年佛教工作規劃(草案)〉(1957年4月12日)，句容縣檔案館藏，檔號：212-1957-2-10。

<sup>127</sup> 〈江浙某些地區嚴重違反宗教政策〉，《宣教動態》，第228期(出版地不詳，1957.05)，頁10-11。

<sup>128</sup> 〈省1956-1957年佛教工作規劃(草案)〉(1957年4月12日)，句容縣檔案館藏，檔號：212-1957-2-10。

<sup>129</sup> 〈關於召開佛教代表會議意見的批復(含報告)〉(1961年10月25日)，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4003-2-503-16。

嚴格進行教育，並加強對這方面的思想認識。」他們還請南京市政協向宗誠「婉言解釋」。<sup>130</sup>

除了討還廟產的行為，江浙各地佛事活動明顯增加。1957 年上半年，佛教界各種法會活動日益興盛。1957 年農曆三月初三，上海龍華寺和靜安寺舉行了盛大的廟會，玉佛寺也趁機召開佛誕水陸法會。3 月初天寧寺恢復方丈制度，隨即啟建七天的觀音法會。<sup>131</sup>

浙江的情況與江蘇大同小異。1956 年「八大」以來，餘姚縣地方政府為了保護名勝古跡、修復風災被毀寺廟，在多地修廟塑佛像，佛教徒和群眾認為「政府又信仰宗教了」。颱風過後，浙北民眾受災較重，人心惶惶。農村中各種謠言廣為流傳，各地佛事活動頻繁。1956 年 10 月到 1957 年 6 月，鞍山、明德、臨山、橫河、慈城、餘姚等鄉鎮，舉行十餘種佛事活動，每次收入多則 100 多元，少則 20 多元。汶溪鄉保雲寺每月集中百餘老太婆念佛，一次收入百餘元。為了廣開方便之門，廟裡允許暫時沒錢繳納懺資的齋主以秋稻充抵。<sup>132</sup>

為了確保各種佛事活動能夠順利進行，活動參與者主動拉攏基層幹部及其家屬。餘姚縣新鄉參加佛事活動的公社幹部、黨團員家屬人數占總數的 60%-70%。姚西項匡鄉更有 90% 的共青團員參加了迎神賽會活動。農業社的幹部不僅不制止各種佛事，反而將「香火錢」作為公社的副業收入。這種現象在餘姚、奉化一帶具有普遍性。1957 年上半年，勝歸鄉的勝歸農業社派了 2 個貧困戶去管理廟宇，共收入香火錢 80 多元。橫河鄉秦堰橋的農業社為了拿香火錢，主動為朝山拜菩薩的香客修路。項匡鄉農業社把賣蠟燭所得作為副業收入，並將信眾燃燒的蠟燭拿走，作為農業社的火油。<sup>133</sup>

<sup>130</sup> 〈區人委函複市協商委員會關於宗誠同志所提清鄉法雲寺廟產抵充公糧等問題的處理意見〉（1957 年 7 月 1 日），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8011-2-12-26。

<sup>131</sup> 洪德，〈常州天寧寺僧眾迎請欽峰為該寺方丈〉，《弘化月刊》，第 4 期（上海，1957.04），頁 19。

<sup>132</sup> 〈關於本縣當前農村迷信活動情況和今後的意見〉（1957 年 6 月 21 日），餘姚縣檔案館藏，檔號：83-6-1。

<sup>133</sup> 〈關於本縣當前農村迷信活動情況和今後的意見〉（1957 年 6 月 21 日），餘姚縣檔案館藏，檔號：83-6-1；〈關於部分地區群眾舉行大規模迷信活動情況報告〉（1957 年 7 月 22 日），餘姚縣檔案館藏，檔號：83-6-1。

奉化縣農業社幹部直接參與賣牒。農曆五月初五，奉化縣方門鄉尊頂寺素有香會賣牒的傳統。1957年，在地方政府和奉化縣佛協的勸阻下，該寺住持正才同意不再賣牒。但寺裡的普通僧眾並不滿意，他們催促正才與方門村農業社協商，由農業社出面賣牒，雙方分成，農業社幹部同意了這個建議。農曆五月初三晚飯後，農業社主任章珍自帶領社內幹部20多人，到寺中做賣牒前的準備工作。當晚由社幹部購紙印刷紅牒2100個，售價每只5角。第二天香會開始，香客甚多，賣牒生意火爆，幾乎一搶而空。農業社幹部見供不應求，索性縮減制牒程式。按照慣例，寧波地區寺廟所售鬼牒，分為紅黃兩種。每張牒必須蓋上寺院「神印」方具有效力。正規的牒很快售罄，賣牒者索性以印代牒，不計紙型。每蓋一印收取人民幣4角。農曆五月初三到初五，奉化三天香會中，共有8000多香客前來朝山進香，農曆初四晚坐夜誦經人數高達2000人。三天時間，尊頂寺和農業社賣牒所獲頗豐。尊頂寺賣牒蓋印共收入1213.6元，方門鄉政府從中提取606.6元的稅費，稅率高達49.98%。方門鄉不僅借廟會增加大筆稅收，發給社幹部工資，還解決了該社四位五保戶僧人的生活問題。<sup>134</sup>

1957年下半年政治氣候驟然轉變。上半年「鳴放」中表現積極的各民主黨派及大量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遭到整肅。1958年3月，華東區五省一市佛教座談會召開。此次會議旨在「使多數中上層宗教職業者堅定愛國主義立場，分清敵我，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明確走社會主義道路，並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以達到提高左派分子，爭取中間派，孤立和分化右派。」<sup>135</sup>宗教界社會主義改造固然令人不安，但此次社教運動主要針對五大宗教裡的中上層人士，本文研究的經懺佛事從業者和需求者多為普通僧尼和民眾，受「反右」影響較小。然而，隨後而來的「大躍進」如同新政權建設之初的土地改革運動，給佛教界帶來第二次翻天覆地的變化。

<sup>134</sup> 〈關於方門鄉梅山頭尊頂寺賣牒事件的調查報告〉(1957年7月15日)，奉化縣檔案館藏，檔號：6-5-1。

<sup>135</sup> 〈關於召開華東區佛教界人士社會主義學習座談會的計畫〉(1958年2月13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A33-2-652。

## 六、結語

1949 年後，出於外交、統戰等多方面的因素，中共政權為佛教的發展留下生存空間。如果說佛教能夠繼續存在主要受政治影響，那麼經懺佛事能夠延續更多出於僧團經濟上的需要。

1949 年以前的民國時代，許多僧尼並非因信仰走入佛門，許多人只將佛教作為一條生存的出路。田租、佛事、布施和香火等諸多收入確實養育了不少「經懺鬼子」。<sup>136</sup>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佛事、佈施等減少，許多年輕僧尼還俗回家，留在寺院中的多是年老體弱無力轉行還俗的老僧，這些人的生活是中共不得不關切的問題之一。所以當局有意留下經懺佛事，作為僧眾自養的一條出路。

對於有能力從事工農業生產的青年僧尼來說，也更願意趕經懺而不是參加生產。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佛事的高回報，第二個則是佛事背後的精神屬性。

經懺僧的收入比較可觀，這種情況在 1949 年新政權建立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沒有變化。1949 年底，上海物價未漲之前，一場最普通的佛事也要 5 萬元，鋪排一些的則高達 100 多萬。<sup>137</sup>浙南的溫州，偏處一隅，遠不如上海繁榮，但經懺價格並不低。1953 年，一位經懺僧一個月的收入可以高出工資最高的工廠僧數倍。<sup>138</sup>而從事生產的僧尼生活比較艱苦。農村僧尼大多事農耕地，土裡刨食的收益低，加上部分民眾特別是地方幹部歧視，僧尼的日子並不好過。城市僧尼無地可種，只能轉業從事手工業生產。他們的工廠和產品競爭力本就較弱，一直依賴政府的財政救濟。地方政府的財力有限，不可能總是為他們周濟。1952 年「五反」運動開始以及隨後展開的三大改造，給倉促上陣的僧尼工廠更大的打擊。大部分工廠無法面對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倒閉不少。

<sup>136</sup> 指的是專門依靠經懺佛事為生的僧尼，暗含鄙視，是種蔑稱。

<sup>137</sup> 〈僧道新生參加生產〉，《大公報》（上海），1949 年 12 月 4 日，4 版。

<sup>138</sup> 〈事由：報告溫州市佛教僧尼生產、生活情況及存在問題〉（1953 年 3 月 5 日），溫州市檔案館藏，檔號：3-2-2。



趕經懺的生活明顯不同。1949 年以前的民國時代，無論是叢林還是小廟，經懺收入都是重要的經濟來源。做經懺成為許多僧尼的看家本領。許多小和尚對佛教的基本儀軌一無所知時，就常常被老和尚拉去充數，經前輩的長期薰染，即便做不到唱念做打樣樣精通，也足可應付齋主。<sup>139</sup>僧尼還能從儀式中獲得精神滿足。佛事本身寄予了齋主濃厚的精神期待，他們希望通過這種儀式超度亡靈，讓已故親人免除身後的痛苦，進入「極樂淨土」。即便是僧團地位最低的「馬騮僧」，<sup>140</sup>法袍一披，經懺一念，也令齋主肅然起敬。不論「經懺鬼子」們日常的生活多麼卑微、困苦，至少在經懺儀式舉辦的那段時間，他們因其神靈與凡間仲介的角色，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兩相比較，做佛事是集較高薪酬、較高地位以及較低的技能要求為一體的職業。由於上述原因，從事勞動生產的僧尼一有機會就重操經懺舊業。

自然災害及民衆的精神需求也是佛事持續存在重要的原因，兩者都不會因為國共兩個政權的更替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與吳景超筆下受天災影響、夾縫求生的華南民衆一樣，<sup>141</sup>1949 年後，水旱饑荒等自然災害仍然給百姓生活帶來巨大的衝擊。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自然災害和經懺佛事類似，也是不以政權轉移為節點、深具「延續性」的存在。天災和佛事兩者之間又有某種必然的連結。馬克斯·韋伯認為：「經濟上最不穩定、最缺乏合理之思考態度的最下層的無產階級，以及經常處於墮入無產階級之威脅、長期受困于貧窮狀態的沒落市民階層，極容易受到宗教布道事業的感召。」<sup>142</sup>正如 1952 年到 1953 年江浙地區水災疫病爆發時，《宣傳通訊》的記者所說，「我們組織群眾進行生產救災的工作活做得不及時或做得不好，衛生設備與醫療工作也遠趕不上群眾需要，某些地方的領導幹部更表現對群眾的疾苦漠不關心，沒有積極設法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群眾性的迷信活動便得以不

<sup>139</sup> 釋聖嚴，《歸程》，頁 104-110。

<sup>140</sup> 馬流僧或為「馬騮僧」之諧音。粵人呼猴子為「馬騮僧」，故「馬騮僧」指的是調皮搗蛋、不守規矩的僧人。參見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頁 45。

<sup>141</sup> 吳景超，《劫後災黎》（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sup>142</sup> 馬克斯·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社會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130。

斷發生和擴大。」<sup>143</sup>天災發生後，執政者的救災能力(糧食供給、醫療救護等)無法滿足災民的需要，民眾就會轉向民間宗教、傳統巫術中尋求幫助。宗教和醫學共同的「拯救」特質，<sup>144</sup>成為 1949 年後經懺佛事仍有需求市場並持續存在的重要原因。

1949-1957 年間江浙地區經懺佛事的演變讓我們看到當代中國大陸佛教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江浙僧團的經懺佛事隨著政治氛圍的變動起伏不定，但一直延續。佛事收入是僧團維持日常生活和寺院運轉重要的經濟來源，僧人也可以通過經懺佛事繼續宗教修行。而且這並不是故事的終點，經懺佛事還將穿透「大躍進」和大饑荒的死亡陰霾，在 1960 年代繼續頑強存在。<sup>145</sup>

---

<sup>143</sup> 〈慎重處理群眾性的迷信活動事件〉，頁 27。

<sup>144</sup> 克利斯蒂納·拉納著，劉靖華、周曉慧譯，《巫術與宗教：公眾信仰的政治學》(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頁 157。

<sup>145</sup> 1960-1965 年，江浙地區許多寺廟經歷了大規模的佛事復甦。除了獨特的喪葬文化和國家調整經濟政策、整體經濟狀況好轉等因素外，基層幹部和城鄉商業部門能從佛事中謀求切實的經濟利益，也是這場復甦重要的原因。

## 徵引書目

### *Bibliography*

#### (一) 史料

##### 1. 檔案

〈上海市佛教寺廟舉辦人民食堂一覽表〉(1950 年 1 月 10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B168-1-742-105。

〈上海市酒菜商業同業公會籌備會會員調查表：蓮花寺〉(1955 年)，上海市檔案館藏，  
檔號：S323-4-21-165。

〈上海市酒菜商業同業公會籌備會會員調查表：龍華寺〉(1955 年)，上海市檔案館藏，  
檔號：S323-4-22-114。

〈召開宗教界上中層人士會議記錄(有關佛教中的教產和組織整理問題)〉(1958 年 8 月  
20 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6-3-19。

〈全國佛教協會成立各地僧尼活動，各地必須注意掌握〉(1953 年 7 月 16 日)，無錫市  
檔案館藏，檔號：A5-1953-2-7-18。

〈改革溫州市佛教經懺的計畫書〉(1950 年 3 月 2 日)、〈為故意破壞民主集中協約聯請  
迅賜喚案說服以維民主團結事〉(1950 年 7 月 7 日)、〈為革除經懺陋習整飭風氣  
設立清眾會〉，溫州市檔案館藏，檔號：51-1-33。

〈省 1956-1957 年佛教工作規劃(草案)〉(1957 年 4 月 12 日)，句容縣檔案館藏，檔號：  
212-1957-2-10。

〈事由：報告溫州市佛教僧尼生產、生活情況及存在問題〉(1953 年 3 月 5 日)，溫州市  
檔案館藏，檔號：3-2-2。

〈酒菜寺院業情況調查表〉(微縮)(1952 年)，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C5-2-158-125。

- 〈區人委函複市協商委員會關於宗誠同志所提清鄉法雲寺廟產抵充公糧等問題的處理意見〉(1957年7月1日)，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8011-2-12-26。
- 〈常州天寧寺歷史資料的編寫提綱(第三次稿)〉(1959年2月12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8-1959-2-2-50。
- 〈常州市宗教工作十年史(初稿)〉(1959年4月)，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8-1959-2-20-27。
- 〈常州市佛教徒召開和平法會的情況報告〉(1953年3月24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14-1953-1-3-164。
- 〈常州市佛教動態及存在問題〉(1953年5月29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3-2-9-57。
- 〈常州市佛教動態及提出幾點意見〉(1953年8月21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3-1-4-64。
- 〈華僑、宗教、民族事務工作會議〉(1953年6月)，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6-3-19。
- 〈僧金芳結論表〉(1952年)，無錫市檔案館藏，檔號：A15-1952-8-353-63。
- 〈僧耀明結論表〉(1952年)，無錫市檔案館藏，檔號：A15-1952-8-353-52。
- 〈關於方門鄉梅山頭尊頂寺賣牒事件的調查報告〉(1957年7月15日)，奉化縣檔案館藏，檔號：6-5-1。
- 〈關於天寧寺情況的調查報告〉(1955年4月26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14-1955-1-5-219。
- 〈關於召開宗教界中上層認識聯誼座談會計畫(草稿)〉(1957年2月26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6-3-19-12。
- 〈關於召開佛教代表會議意見的批復(含報告)〉(1961年10月25日)，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4003-2-503-16。

〈關於召開華東區佛教界人士社會主義學習座談會的計畫〉(1958年2月13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A33-2-652。

〈關於本縣當前農村迷信活動情況和今後的意見〉(1957年6月21日)，餘姚縣檔案館藏，檔號：83-6-1。

〈關於抗旱運動中群眾的迷信活動情況及與佛教徒活動的關係問題的調查報告〉(1953年8月30日)，奉化縣檔案館藏，檔號：6-1-1。

〈關於佛教會寺廟素齋業取消外加小帳陋規勞資協議草案〉(微縮)(1952年1月9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C5-2-156-39。

〈關於部分地區群眾舉行大規模迷信活動情況報告〉(1957年7月22日)，餘姚縣檔案館藏，檔號：83-6-1。

〈關於常州市宗教情況調查的報告〉(1952年10月22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14-1952-1-2-113。

〈關於處理最近佛教活動中混亂情況的指示〉(1953年5月5日)，溫州市檔案館藏，檔號：87-5-80。

〈關於華僑、宗教工作檢查情況報告〉(1956年12月1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號：B43-1956-3-19-56。

〈關於圓明講堂法會的復函〉(1953年3月7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A33-2-650-4。

〈關於圓瑛和尚來天童寺療養的簡報〉(1953年7月3日)，鄞縣區檔案館藏，檔號：5-2-1953-1-8。

〈關於當前農村宗教迷信活動情況報告〉(1954年6月1日)，景寧縣檔案館藏，檔號：5-2-2。

〈關於對高旻寺開展社教運動的請示報告〉(1966年5月6日)，揚州市檔案館藏，檔號：A1-3-54-39。

〈關於禪慧和尚錯劃為右派分子的改正決定〉(1980年12月16日)，揚州市檔案館藏，  
檔號：A1-203-33-189。

《靈岩山萬年簿(1926-1949)》，靈岩山寺檔案館藏。

## 2. 回憶錄與文史資料

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土地改革中若干問題的通報〉(1951年4月)、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佛教、回教工作的指示〉(1952年3月)、李維漢，〈關於目前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幾個問題〉(1951年1月25日)，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劍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20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北京：中國文獻出版社，1992。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編，《統戰政策文件彙編》，第4冊，內部發行，195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武進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武進文史資料》，第8輯，自引本，1987。

句容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句容文史資料》，第9輯，句容：句容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

金山寺本安法師口述，馮辰年、周文逸、楊樹慧採訪記錄，〈解放前後的天寧寺〉(1986年4月15日)，天寧寺檔案館藏，無檔號。

金山寺林祥法師口述，周文逸、楊樹慧採訪記錄，〈解放前後的天寧寺〉(1986年3月15日)，天寧寺檔案館藏，無檔號。

釋聖嚴，《歸程》，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釋樂觀，《六十年行腳記》，臺北：海潮音社，1977。

### 3.報刊

一禪，〈鎮江金山江天寺略況〉，《弘化月刊》，第1期(上海，1952.01)，頁14。

了願、靜海，〈常州市佛教徒抗美援朝反對美帝武裝日本示威遊行大會特寫〉，《現代佛學》，第4期(北京，1951.04)，頁34。

〈上海市佛教界祝願世界和平法會收支賬略〉，《弘化月刊》，第4期(上海，1953.04)，頁16。

上海市佛教協會，〈上海市佛教協會教理研究室座談會：討論關於肅清上海佛青出版的《覺訊》及小冊子中反動言論影響的問題(摘錄)〉，《弘化月刊》，第2期(上海，1956.02)，頁14-16。

〈上海寺院〉，《弘化月刊》，第9期(上海，1949.09)，頁8。

上海佛教青年會，〈本會舉辦釋迦佛七 籌募高旻寺道糧 服務部代收醫藥供養的捐款〉，《覺訊》，第4期(上海，1953.04)，頁15。

〈六、七、八月營業部份工商業稅 市政府稅務局公佈適用稅率表〉，《文匯報》(上海)，1950年8月26日，5版。

王良佑，〈華東區水、旱、風、蟲災情況〉，《內部參考》(出版地不詳)，1953年8月3日，頁2-3。

王良佑，〈華東區的災荒情況〉，《內部參考》(出版地不詳)，1953年5月9日，頁104-105。

〈中國人民銀行遵照國務院的命令 今起在全國發行新人民幣〉，《人民日報》(北京)，1955年3月1日，2版。

方子藩、陳三洲、倪正和等，〈為寶華山隆昌寺僧眾募化齋糧緣起〉，《覺有情》，第3期(上海，1950.03)，頁24。

心懺，〈蘇州佛教界的新面貌〉，《現代佛學》，第7期(北京，1952.07)，頁26-27。

五臺山供養功德會，〈五臺山供養功德會第一屆募捐告一段落〉，《弘化月刊》，第 3 期(上海，1954.03)，頁 18。

巨贊、喜饒嘉措等，〈緣起〉，《現代佛學》，第 9 期(北京，1950.09)，頁 32。

〈各地佛教動態簡訊〉，《現代佛學》，第 4 期(北京，1953.04)，頁 27。

〈江浙某些地區嚴重違反宗教政策〉，《宣教動態》，第 228 期(出版地不詳，1957.05)，頁 10-11。

〈佛門弟子走向生產〉，《大公報》(上海)，1949 年 9 月 6 日，2 版。

〈佛門弟子辦食堂 壽聖庵兼辦軍人食堂 普濟寺食堂也即開辦〉，《大公報》(上海)，1949 年 9 月 14 日，3 版。

宋國清，〈各地紛紛成立佛協並辦法會〉，《覺訊》，第 12 期(上海，1952.12)，頁 11。

浮天、紅燈、神鐘，〈華東各地佛教徒投入生產熱潮〉，《覺訊》，第 4 期(北京，1951.04)，頁 10。

邵瓊，〈江蘇省句容等地發生水災〉，《內部參考》(出版地不詳)，1953 年 7 月 2 日，頁 22。

邵瓊，〈江蘇省發生秋蝗〉，《內部參考》(出版地不詳)，1953 年 8 月 3 日，頁 3。

〈肥皂火柴勁升〉，《文匯報》(上海)，1949 年 6 月 30 日，5 版。

郁麗天，〈和尚的蛻變〉，《大公報》(香港)，1948 年 8 月 30 日，8 版。

洪德，〈常州天寧寺僧眾迎請欽峰為該寺方丈〉，《弘化月刊》，第 4 期(上海，1957.04)，頁 19。

康寄遙，〈瞻禮蘇州靈岩山寺的感言〉，《弘化月刊》，第 9 期(上海，1953.09)，頁 14。

曹培靈，〈無錫市佛教協會的整教工作開始了〉，《現代佛學》，第 1 期(北京，1953.01)，頁 24。

曹培靈，〈無錫佛協報告工作情況〉，《覺訊》，第 12 期(上海，1952.12)，頁 16。



- 從善，〈我們應該向揚州高旻寺看齊〉，《覺訊》，第 7 期(上海，1951.07)，頁 4-5。
- 〈問題商討〉，《現代佛學》，第 9 期(北京，1951.09)，頁 20。
- 斯雨，〈常州一年來佛教動態的報告〉，《覺訊》，第 2、3 期(上海，1951.03)，頁 22。
- 〈鄞山寒色〉，《申報》(上海)，1887 年 12 月 19 日，2 版。
- 〈報告一個如法供養三寶的好消息〉，《弘化月刊》，第 10 期(上海，1953.10)，頁 20。
- 圓瑛，〈圓明講堂水陸道場講經法會收入支出〉，《弘化月刊》，第 1 期(上海，1953.01)，頁 16。
- 〈圓瑛大師被選為亞洲和平會議的中國代表〉，《弘化月刊》，第 9 期(上海，1952.09)，頁 16。
- 〈圓瑛大師維護名山古剎道場啟建水陸法會〉，《弘化月刊》，第 8 期(上海，1952.08)，頁 16。
- 〈慎重處理群眾性的迷信活動事件〉，《宣傳通訊》，第 17 期(出版地不詳，1953.05)，頁 26-29。
- 新華通訊社，〈江蘇省各地疫病情況嚴重〉，《內部參考》(出版地不詳)，1953 年 2 月 3 日，頁 30-31。
- 新華通訊社，〈印度文化代表團在西安參觀興教寺大雁塔〉，《現代佛學》，第 7 期(北京，1955.07)，頁 28。
- 〈僧道新生參加生產〉，《大公報》(上海)，1949 年 12 月 4 日，4 版。
- 魏文華，〈江蘇省災民外逃求生的現象已在三十多個縣中發生〉，《內部參考》(出版地不詳)，1954 年 11 月 22 日，頁 281-282。
- 〈歡迎中國佛教訪緬代表團的歸來〉，《現代佛學》，第 6 期(北京，1955.06)，頁 1。
- 〈靈岩呼籲〉，《弘化月刊》，第 8 期(上海，1949.08)，頁 8。
- 〈靈岩近訊〉，《弘化月刊》，第 7 期(上海，1949.07)，頁 8。

靈岩寺，〈蘇州靈岩山寺各部門福利事業概況表〉，《弘化月刊》，第8期(上海，1951.08)，頁12-13。

## (二) 近人論著

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周恩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王棟等主編，《民俗論叢》，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蘇省志》，第70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江蘇省志：農業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克利斯蒂納·拉納著，劉靖華、周曉慧譯，《巫術與宗教：公眾信仰的政治學》，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份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吳康主編，《中華神秘文化辭典》，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吳景超，《劫後災黎》，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

李靖莉，《黃河三角洲經濟史研究(1840-1978年)》，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8。

杭州市民政局編，《杭州市民政志》，杭州：杭州市民政局印，1993。

《法鼓全集》編輯小組，《法鼓全集》，第5輯第5冊，臺北：法鼓文化，2020。

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1912-1949)》，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

侯坤宏，《浩劫與重生——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大陸佛教》，臺南：妙心出版社，2012。

栗志剛，〈人民幣匯率制度演變的政治分析〉，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博士論文，2007。

馬克斯·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社會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陳兵編著，《新編佛教辭典》，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4。

夏亨廉、肖克之主編，《中國農史辭典：中國農史普及讀本》，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4。

張學恕編，《中國長江下游經濟發展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0。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2卷(1949-195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黃運喜，〈民國時期寺廟管理法規的演變〉，收入弘法寺編，《行願大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1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楊穎奇主編，《江蘇通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1949-1978)》，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聖凱，《中國佛教懺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趙昭，《流香「稅」月》，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10。

霍姆斯·維慈，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下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

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羅楊、唐佩娟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叢書：浙江寧波北侖卷》，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5。

蘇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蘇州市志》，第3冊第52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Brooks, Timothy.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Late-Imperial Origins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Making Religion, Mak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Yoshiko Ashiwa and David L. Wank, 22-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Goossaert, Vincent and Palmer, David.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Kiely, Jan. "The Communist Dismantling of Temple and Monastic Buddhism in Suzhou." In *Recovering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Jan Kiely and J. Brooks Jessup, 216-25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 Moeller, J.Prip. *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ies: Their Plan and Its Function as a Setting for Buddhist Monastic Lif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1.
- Wang, Xiaoxuan. "The Dilemma of Implementation: The State and Relig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90." In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ited by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259-27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Welch, Holmes. *Buddhism und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三) 期刊

- 王海光，〈蘇南土改往事〉，《同舟共進》，第 11 期(廣州，2016.11)，頁 73-77。
- 王翔，〈從「裁厘認捐」到「裁厘加稅」——清末民初江蘇商民的兩次重要鬥爭〉，《近代史研究》，第 3 期(北京，1988.06)，頁 49-64。
- 邵佳德，〈近代的應赴僧及經懺佛事——以江浙地區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第 4 期(北京，2014.08)，頁 45-56。
- 高萬桑著，黃郁旋譯，〈近代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宗教政策與學術典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4 期(臺北，2006.12)，頁 169-209。
- Welch, Holmes. "Facades of Religion in China." *Asian Survey* 10, no.7 (1970): 614-626.

## **Th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Centered on Buddhist Ritual Service (1949-1957)**

Liu, Qio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In October 1949, the Communist Party established a new regime in mainland China.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me, the government developed a number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mpaigns, which directly change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Buddhists. Changes in land ownership made it impossible for monasteries to rely on income from field rents, and the Five-anti Campaign and the subsequent reform of the ownership system plunged the fledgling Sangha's production efforts into a quagmire, resulting in major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monasteries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regions. While land rents, donations from lay Buddhists, incense and production income were under attack,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the Buddhist ritual services for the monastic community became even more obvious. Although Buddhist organizations were subjected to transformations and controls through various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even or eight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Buddhist ritual service continued to exist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form of religious practice for the Sangha, as well as a source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ir livelihood. In modern history,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he Buddhist

ritual service to monks, nuns and monasteries,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ir spiritual practic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Keywords:** Buddhist ritual service, Jiangsu and Zhejiang districts, monastic economy, Buddhist survival